

亚太社会科学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主编

沈胜林 博士 / 副教授

黄冈师范学院



Asia Pacific Science Publications Co. Ltd.

亞太科學出版社

《亚太社会科学》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2025 年第 1 期，双月刊

主办单位：亚太科学出版社（ASIA PACIFIC SCIENCE PUBLICATIONS COMPANY LIMITED）

编辑出版：亚太科学出版社（中国香港）、《临床诊断与治疗杂志》编辑部

国际发行：亚太科学出版社数字发行中心

国际统一刊号：ISSN（网络版）：3080-2121；ISSN（印刷版）：3080-2113

主 编：沈胜林（黄冈师范学院）

副 主 编：李威（黄冈师范学院） 贺天成（浙江工业大学）

出版总监：张述之 严谋奇

学术编辑：杨 斌 卢成伟 陈思岑 张 菊

责任编辑：刘欣洋 汪朝阳 卢志强 付 燎 聂志成

校队编辑：严丽萍

排版编辑：闫 瑾

美术编辑：闫丽荣

网 址：<http://www.apspublisher.com/>

邮 箱：editor.apss@apspublisher.com

地 址：中国香港屯门工业大厦 B3.07/F 20 号

《亚太社会科学》是一本国际化、同行评审的开放获取学术期刊，致力于推动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创新与方法拓展，聚焦亚太地区社会发展的关键议题与实践挑战。期刊倡导以社会批判理论、人文关怀与跨学科视角切入，深入探讨社会结构、制度变迁、文化认同与公共事务等重要问题，尤其关注社会不平等、群体边界与知识建构等跨领域议题的研究。期刊重视研究设计的规范性与方法应用的科学性，欢迎聚焦理论构建、机制分析与现实问题的高质量研究成果。

常设栏目：本刊特稿；区域治理创新；社会转型研究；文化认同与传播；社会保障前沿；法律与政策分析；哲学研究；教育发展研究；人口迁移研究；社会组织研究等。

版权声明：本刊已许可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在中国知网及其系列数据库产品中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本刊发表的所有文字、图片、商标和其他相关资料均符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 4.0 国际许可协议，允许以任何方式分享与复制，只需要注明原作者和文章来源，并禁止将其用于商业目的。所有条款、版权、商标和其他相关材料，也同时受中国香港法律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管辖及保护。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即视为同意我刊上述声明。

《亚太社会科学》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2025 年第 1 期，双月刊 2025 年 4 月 25 日出版

目 录

创刊词	• 1 •
日本东亚同文会编《中国省别全志》陕西卷研究	/ 胡竹清 • 3 •
马克思主义中国式现代化的主线生成研究	/ 杨杨 杜玲 • 11 •
社会工作实践嵌入孤独症儿童社交障碍个别化干预方法的创新研究	
	/ 王艺静 路安平 高洁 张子晨 吕苏航 • 16 •
语用逻辑视域下翻译技术伦理的重层建构	/ 孙望舟 舒文洲 • 21 •
黄河战略背景下黄河生态搬迁安置点人居环境满意度评价与提升路径研究	
	/ 刘嘉祎 张林瀚 刘蕾 董卓涵 周晶晶 • 30 •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研究	
	/ 张闰雨 • 36 •
《实践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汲取	/ 毛涛 杜孟学 • 42 •
面向智能装备的供应链管理优化研究	/ 赖恩毅 李明磊 王惟臻 • 50 •
数字空间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的产生及应对	/ 许婧 • 55 •

创刊词

以文明互鉴之笔 绘区域发展之图

社会科学研究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基石，也是推动社会经济不断向前发展的不竭动力。当前，在全球化背景与信息化浪潮的席卷下，社会科学研究呈现出开放性、多元化与创新性特点，亚太地区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其对于社会科学的研究也日益成为国际学界关注的焦点。亚太地区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其多元的文化传统、复杂的社会转型与独特的发展路径，构成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天然实验室”。

《亚太社会科学》秉持“扎根区域、贯通古今、对话世界”的学术宗旨，立足亚太、面向世界、放眼全球，是一本国际化、同行评审的开放获取学术期刊，致力于推动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创新与方法拓展，聚焦亚太地区社会发展的关键议题与实践挑战。期刊倡导以社会批判理论、人文关怀与跨学科视角切入，深入探讨社会结构、制度变迁、文化认同与公共事务等重要问题，尤其关注社会不平等、群体边界与知识建构等跨领域议题的研究。期刊重视研究设计的规范性与方法应用的科学性，欢迎聚焦理论构建、机制分析与现实问题的高质量研究成果。

本刊近年所设置的主要栏目包括本刊特稿；区域治理创新；社会转型研究；文化认同与传播；社会保障前沿；法律与政策分析；民族与宗教研究；教育发展研究；人口迁移研究；社会组织研究等。刊物重视研究设计的规范性与方法应用的科学性，欢迎聚焦理论构建、机制分析与现实问题的高质量研究成果。我们期待通过跨学科、跨地域的对话，为社会科学研究者、区域教育与管理政策制定者和一线教师提供或供参考的多元分析视角，助力亚太地区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经济社会的发展，必将离不开学术研究的创新发展。本刊将以学术传播为己任，秉承以下学术发展原则：

一是坚持学术至上。本刊坚持学术导向，严格遵守学术规范，制订明确科学的学术管理制度，尊重学者，尊重学术，确保刊发的研究成果具有较强的科学性与前沿性。

二是坚持问题导向。本刊鼓励广大学者们和研究者们以实践需求为出发点，直面科学

研究中的社会关切与社会责任，切实回应社科领域的真实挑战，致力于解决社科领域中的关键问题，为推进社会科学研究的创新发展铺砖引路。

三是坚持开放包容。本刊立足于国际视野和全球化背景，充分尊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研究理念，全面坚持开放与包容的理念，既鼓励生动活泼的学术探讨，也鼓励激情澎湃的学术争鸣，以此才能真正促进教育领域的文明互鉴与知识共享。

各位同仁，《亚太社会科学》的诞生，离不开亚太地区高校、研究机构各位专家的支持，更离不开每一位投稿者、审稿人和读者的支持和信任。我们诚挚邀请全球教育同仁携手同行，以学术思想的碰撞激发灵感，以社会科学理论和实践研究创新服务于社会进步与发展。

社会科学研究是播种希望的事业，而学术期刊是点亮思想的火炬。愿《亚太社会科学》成为这一征程中的见证者、参与者和引领者，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多的智慧与力量。

衷心祝愿《亚太社会科学》刊物越办越好，成为全球社会科学界的一个亮点品牌！

《亚太社会科学》编辑部

主编：沈胜林

2025 年 4 月 18 日

日本东亚同文会编《中国省别全志》陕西卷研究 ——区域国别学的视角

胡竹清

(西北大学, 陕西省西安市, 710127)

版权说明: 本文是根据知识共享署名 - 非商业性使用 4.0 国际许可协议进行发布的开放获取文章。允许以任何方式分享与复制, 只需要注明原作者和文章来源, 并禁止将其用于商业目的。

摘要: 《中国省别全志》系日本东亚同文会在东亚同文书院学生对中国各地所做田野研究的基础上, 编纂出版的一套中国分省志书, 也是绝无仅有的由外国人编撰的中国志书。从区域国别学的视角看, 该志书还是近代日本中国学研究的一个代表作。文章以陕西省卷为例, 对其编纂背景与目的、资料来源、内容构成、记述特点等进行了分析, 并从正反两方面对其进行了评价, 指出其对我们今后开展区域国别研究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 东亚同文书院; 区域国别学; 日本

DOI: <https://doi.org/10.62177/apss.v1i1.306>

中国的地方志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然而, 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 方志修纂难以系统开展, 各省方志合集更属稀缺, 除白眉初主编的并不完善的《中华民国省区全志》外, 并无二例。而一个引人注目、发人深省的情形是——建立在周密的实证调查基础上的完整的中国各省志书从编, 是日本人于 20 世纪上半页修纂、出版的, 这便是《支那省别全志》与《新修支那省别全志》。”^[1]2015 年, 中国国家图书馆将这两套志书进行影印并改名为《中国省别全志》出版。在此前后, 学界还涌现了一批利用这两套志书开展中国边疆史、地方史的研究, 如周长山、周凌瀚^[2]对《中国省别全志》广西卷的研究, 杨德芳^[3]对《新修中国省别全志》贵州卷的研究, 张文芝^[4]对《新修中国省别全志》云南卷的分析, 李彬^[5]对《中国省别全志》四川卷的研究等。研究结果一方面指出其服务日本侵华的负面作用, 同时对其资料价值也给与肯定。近年来, 这两套志书中的一些卷次也被译成汉语, 足见学界对其关注。

对于“日本人给中国编纂地方志”一事, 可以从一个学术视角去把握, 即区域国别学 (Area studies) 视角。区域国别学是一门对世界上不同区域和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历史等多方面进行综合深入研究的学科领域 (2022 年 9 月, 区域国别学被增列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著名的非洲学

作者简介: 胡竹清 (1986 年 9 月); 男; 汉族; 陕西省咸阳市; 博士研究生; 讲师, 研究方向: 近日中日关系史。

专家、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刘鸿武教授指出：“我们今天开展区域国别学，换言之就是中国要给世界上近 200 个国家和地区写地方志。”^[6]而东亚同文会编纂的《中国省别全志》，正是一百年前日本人给中国编写的地方志。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区域国别角度对《中国省别全志》的编纂背景与目的、资料来源、内容构成和记述特点等进行分析，对我们今后更好发展区域国别学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在考察《中国省别全志》前，有必要对与其中相关的东亚同文会、东亚同文书院，以及东亚同文书院“中国大旅行调查”做一说明。三者间的关系简言之就是，东亚同文会是东亚同文书院的主办机构和《中国省别全志》的编纂机构，而编纂《中国省别全志》的资料则来源于东亚同文书院学生对中国所做的“大旅行调查”。

一、东亚同文会、东亚同文书院及其“大旅行调查”

甲午战争后，日本国内兴起了一股研究中国问题的热潮，随之也成立了不少研究中国和东亚问题的组织和团体。1898 年 11 月 2 日，东亚同文会在东京成立，这是日本第一个全国性的“兴亚”组织^[7]，首任会长是贵族院议长近卫笃磨。该会还公布了以下四条活动纲领：（1）保全中国；（2）促使中国改革；（3）研讨中国时事，以期厉行；（4）唤醒舆论。东亚同文会的总部虽然位于东京，但其主要活动机构则设在中国。其中，东亚同文书院和东京同文书院是该会的主要事业。东亚同文会与日本政府关系密切，“从 1899 年开始，每年从日本外务省机密费中获得 4 万日元津贴。津贴是不间断的，东亚同文会也忠实地向外务省汇报情况和报告，这使该会打上了半官方的印记，成为 20 世纪初 20 多年间日本对中国进行研究及文化事情最重要的机构。”^[8]1922 年，东亚同文会改组为财团法人，成为发展中日两国文化的教育组织。

1900 年 5 月 12 日，东亚同文会在中国江苏南京设立了南京同文书院，首任院长是根津一。同年 8 月，受义和团运动影响，南京同文书院迁往上海，1901 年 5 月改称东亚同文书院（以下简称“书院”）。办学宗旨名为“讲中外之实学，教中日之英才”，实为日本培养掌握汉字文化，熟知华人社情的“中国通”。书院初设政治、商务两科，学制均为三年，学生主要从日本各府县选拔（多为公费生）。1939 年，经日本政府批准，书院升格为东亚同文书院大学。1945 年日本战败后，书院关闭。

书院在办学中有一项特色活动——“大旅行调查”：每年将毕业班学生（日本人）分为数组（每组 3-7 人），派往中国内地，花费 3-6 个月的时间做各种专题调查，并将收集来的资料和信息整理撰写成调查报告书提交学校。这些调查报告书除了书院和东亚同文会各保存一份外，还要另外抄送三份，分别提交给参谋本部、外务省和农工商省。大旅行调查从 1901 年开始，一直持续到 1945 年。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约五千名书院学生对中国进行了“卷地毯”式的调查，调查范围几乎遍及除西藏外的中国所有省份，旅行线路总计达 700 条（见下图 1），调查内容包括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日本书院研究的权威、爱知大学文学部名誉教授藤田佳久指出：“东亚同文书院学生所做的中国大旅行调查，不仅规模宏大，而且还是一种有组织的行为，这样的调查不仅在当时的世界上找不到先例，甚至也是迄今为止日本人在海外进行的规模最大的调查活动。”^[9]

由于大旅行调查是一届学生接着一届进行，所以有关中国的调查报告也是越积累越多。而书院则以学生提交的这些调查报告为基础，相继编纂出版了一系列有关中国的研究丛书。其中影响最大、最负盛名的是《中国经济全书》（全 12 卷，1907-1909）、《中国省别全志》（全 18 卷，1917-1920）、《新修中国省别全志》（全 9 卷，1941-1946），这三部丛书共同奠定了书院在日本中国学界的历史地位。

如前所述，国内学界近年来也非常关注《中国省别全志》（以下简称《全志》）《新修中国省别全志》（以下简称《新修全志》）。兰州财经大学高启安^[10]教授评价《全志》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以新的视

角、新的科学理念和方法修撰的志书。”日本学者藤田佳久^[1]更是将《全志》称为“世界上第一部民国中国地志丛书。”

《全志》共18卷。各卷在篇幅、记述内容和侧重上虽略有不同，但大体包括“总论”“开市场”“贸易”“都会”“交通及运输机构”“邮政及电信”“生产业及主要物产”“农业及畜牧业”“商业习惯”“金融货币”“度量衡”等内容。《全志》在体例上横分门类、纵述始末，以横为主。综合运用述、志、图、表等多种体裁，以志为主。结构方面采用编、章、节、条等层次来组织内容。重点记述清末民初这一时期各省的史实，详今略古。语言简洁平实。



图1. 书院第5期—23期学生的旅行调查线路图（1908—1926）

注：旅行线路指图中的实线。

来源：藤田佳久（2020）：41.

二、《中国省别全志·陕西省》

陕西卷是《全志》中的第7卷，共897页，约42万字。记述的时间上限自事物发端，下限断至1916年。记述的地理范围包括关中大部分地区、陕南大部分地区，以及陕北部分地区，详县略市。卷中附照片60张，（手绘）地图及事物说明图57张，附西安府城图、汉中府城图各1张，卷尾附陕西省地图1张。本卷的主要编纂负责人是山崎长吉，松本良男、清水董三也承担了部分编纂工作。

（一）编纂背景与目的

关于《全志》的编纂背景与目的，各卷卷首的两篇序文中都有提及。第一篇由东亚同文会干事长小川平吉在大正六年（1917）三月撰写的序文中写道：

中国自古以来重视地志，是世界上所存地理书籍最齐备的国家。上代有《禹贡》（中略）然而至近世，却无完整的地志著作问世，尤其是缺乏现实情况的记录，此不能不为国内外人士深感遗憾。本会编辑本书正是基于以上原因，拾漏补缺，以便于开展对中国的全面研究，应当务之急。

第二篇由东亚同文书院院长根津一撰写的序文提到：

我国（日本）和中国在政治、经济上有特别重要紧密的关系。欧洲一战结束后，应该早想到的是中

国将成为世界问题的中心，我国国民必须尽快熟悉了解中国的国情民物，深谋远虑，防患未然。（中略）然而讲明当今中国的国情民物，怎能不是我国人的一大紧急要务。唯独遗憾的是，中国国情复杂、民情物况繁多错杂，缺乏有益于钻研中国的良书。作为一衣带水的比邻，我国人中彻底精通中国情况的人却很少。本院虽才疏学浅，愿尽绵薄之力，对中国的地理、气候、人情、风俗、物产，以及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大小事情进行讲究阐明，为世人研究中国提供便利。

从两篇序文看，日人编纂《全志》的背景与当时中日两国的交往，尤其是日本的对华战略有密切关系。而当时市场上缺乏记述中国国情书籍的这一现状是促使东亚同文会编纂《全志》的一个直接原因。如前所述，书院是由主张“中国保全论”的东亚同文会所设立，自然会反映该会的方针。另外，“书院接受日本政府的财政援助，并在行政上接受日本文部省和外务省的管辖和监督。书院院长的任命、系科的置废，学制的变更等事务，大都由政府决定。”^[12]而且，从人物关系看，不论是书院还是东亚同文会，都与日本政府、军方之间存在复杂而密切的联系（见下表 1）。郭墨寒^[13]从书院办学的角度指出，东亚同文会编纂《全志》的目的之一是对书院学生大旅行调查资料的总结与炫耀，是日本重要的文化形象工程。笔者比较认同这种观点。借用今天的话语就是，“一流大学必须要有一流的学术成果”。编纂《全志》就是对书院办学成果最好的一个宣传和展示，有助其更好从日本政府方面获得更多资助。

表 1. 东亚同文会历任会长及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历任院长（校长）

东亚同文会历任会长			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历任院长（校长）		
任期	姓名	简介	任期	姓名	简介
第 1 任 （1898-1904）	近卫笃磨	公爵、贵族院议长	第 1 任院长 （1901-1902）	根津一	陆军出身，曾在参谋本部任职，长期从事对华谍报工作
第 2 任 （1904-1907）	青木周藏	子爵、日本外相	第 2 任 （1902-1903）	杉浦重刚	众议员、国粹主义者，裕仁天皇的老师
第 3 任 （1907-1918）	锅岛直大	候爵、第 11 代佐贺藩主	第 3 任 （1903-1923）	根津一	
第 4 任 （1918-1936）	牧野伸顯	伯爵，大久保利通之子、日本政坛元老	第 4 任 （1923-1926）	大津麟平	台湾总督府官僚、岩石县知事、德岛县知事
第 5 任 （1936-1945）	近卫文磨	公爵，贵族院议长、三次出任日本首相	第 5 任 （1926-1931）	近卫文磨	贵族院议长、东亚同文会副会长
			第 6 任院长兼第 1 任校长 （1931-1940）	大内畅三	众议员，1939 年升格为大学后的首任校长
			第 2 任 （1940-1944）	矢田七太郎	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曾参加 1927 年东方会议
			第 3 任 （1944-1945）	本间喜一	末代校长，爱知大学创始人

来源：冯天瑜 (2018):1-17。由笔者整理制作而成。

（二）资料来源

陕西卷在卷首“凡例”中提到，该卷主要参考了以下 7 期、共计 9 个调查班的调查报告，时间跨度为 1907-1916 年。

1. “陕西河南班”第5期生、调查时间为1907年
2. “晋秦班”第7期生、1909年
3. “甘肃鄂尔多斯班”第8期生、1910年
4. “清化镇汉中班”第9期生、1911年
5. “甘肃四川班”第11期生、1913年
6. “秦蜀班”第11期生、1913年
7. “陕西班”第13期生、1915年
8. “河南山西班”第14期生、1916年
9. “湖北四川班”第14期生、1916年

从以上各调查班的名字推测，有的调查班以陕西省为中心开展调查活动，而有的则同时横跨几个省份（图2），即“编纂陕西卷的资料也有一部分是从其他省份的调查报告中摘录的。另外，《陕西省》中的各章（节）也对具体引用了哪一期学生的调查报告书有明确说明。比如，第8编第14章“乾州的货币及金融机构”引用了第8期、第9期、第11期三期学生的调查报告，说明有三期学生都到过乾州，只不过每期学生的调查内容可能不尽相同，后人在调查时候应该是对前人未调查的内容进行了补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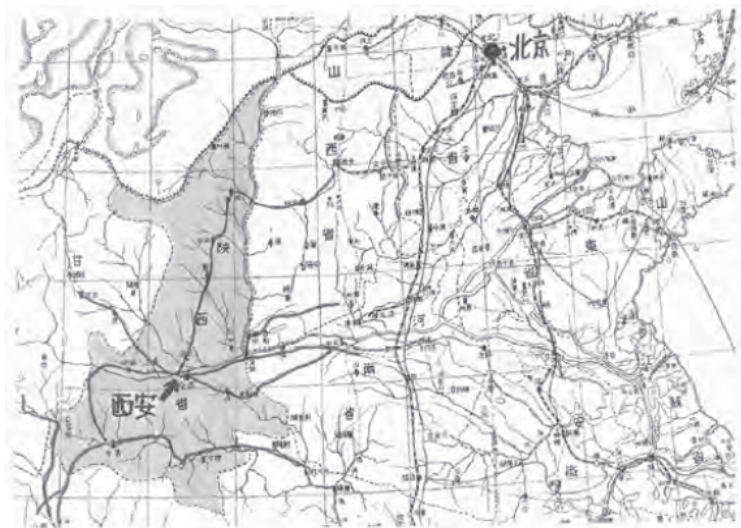


图2. 书院第5-14期学生的调查线路图（1908-1917）

来源：藤田佳久 (2018):15.

（三）内容构成

《陕西省》由10编构成。第1编是“总说”，包括6章，分列陕西省的沿革，清代及民国初期的行政区划，面积、人口与人种，地势河川，气候及交通。第2编是“都会”，共43章，分列43个县（市）的概况，包括位置、人口与户数、城墙与街道、交通、农业和工商业、官署及主要建筑物、饮水用、物价及生活水平等。第3编是“交通及运输机构”，由4章构成，介绍了陆运、铁道、水运以及各地间的陆运及水运。第4编是“邮政及电信”。第5编是“生产业及矿业”，由5章组成，介绍了（27个县的）农业、养蚕业、林业、畜牧和（11个县的）矿产。第6编是“主要物产及工业”，设5章，介绍了石油、麻、（23个县的）主要物产、（15个县的）工业。第7编是“交易及进出口商品”，设2章，介绍了4个县的商业状态、9个县的进出口商品。第8编“货币及金融机构”，共25章，列举了25个县的货币及金融机构。第9编“商业机构及商业习惯”，共2章。第10编是“度量衡”，共23章，介绍了（20个县的）度量衡、海关以及中国政府所定的度量衡。

(四) 记述特点

较之国人编纂的旧地志,《全志》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 视角独特、材料新颖。由于是外国人看待中国事物,所以记载了很多他们认为重要、新奇,而在我们看来可能是平淡无奇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到了今天就是很有价值的史料。比如,陕西卷在介绍各(市)县时,除了位置、市况、交通、城墙、城内主要街道及著名建筑物、商业和农业相关信息,还记载了饮用水(水质和口感)、生活水平(日用品的物价及工资水平)及贫富差距情况等信息。另外,本卷中还附记了一些公司合约与章程,如《创办陕西第一牧场简章》《中美石油合办契约》,列举了一些当铺、票庄等金融机构发行的票据,如邠州便民当发行的当票(图3)、宜川县市面上流通的钱票子(图4)等。这些东西在我们的史书和方志中非常少见,随着时间的流逝,其史料价值愈显珍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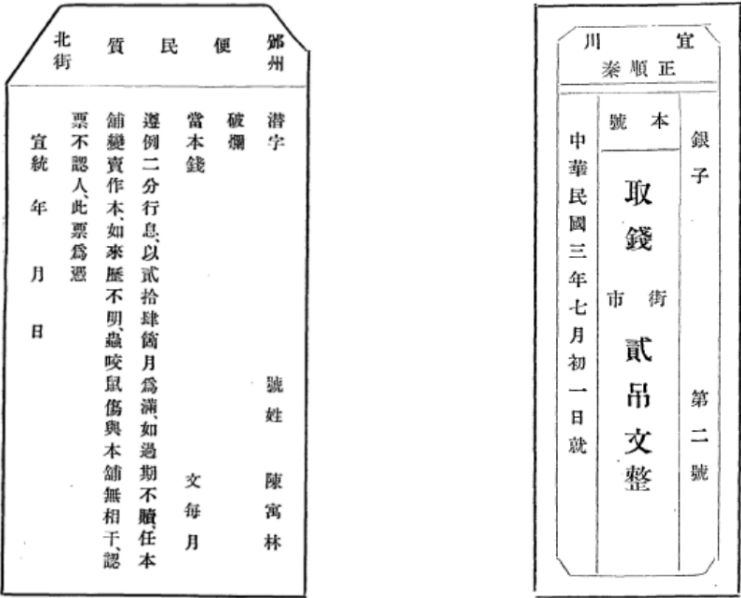


图 3. 邠州便民当当票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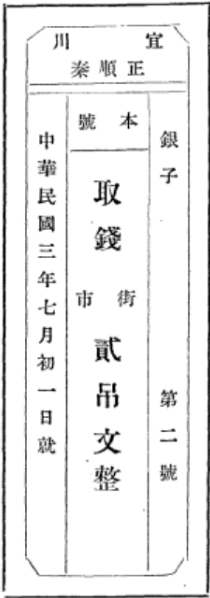


图 4. 宜川县钱票子样本图(正面)

2. 方法科学、手段先进。与以往国人编纂旧地志时,侧重对前人资料的引述不同,《全志》的编纂建立在日本人对中国进行田野调查的基础之上,背后蕴含的是西方实证科学思想。从陕西卷所列的图片、地图及其他信息看,当时每个调查班都配备了照相机,学生们也掌握地理学、测绘学及统计学相关知识。比如,第3编第4章关于“凤岭-留坝间思德桥处的河流信息”写道:“河宽16米,水深2.5米,流速3米/秒”。^[14]很难想象,当时的日本人是如何测量这些数据的。第1编第4章关于陕西北部的地质情况写道:“这里的黄土也含有很多的石灰,如果往地上投放一些酸类物质的话,就能看到发生化学反应。另外,由于这里的水也含有大量的石灰和酸分,所以如果将硝酸银放入水中,水就会变成乳白色”。^[14]可见日本人在当时已掌握了西方化学相关知识。

3. 图表丰富、数据详实。正所谓“物非图则不明,事非表则不详”,用图、表来说明事务,简明易晓。陕西卷中的图片(包括照片、手绘地图、事物说明图)多达116张,表格约140余张。该卷对很多事物的记述都不是停留在简单粗线条式的文字描述上,而是辅之以翔实的数据。这些数据有的来自国民政府统计,有的是书院学生亲自调查所得。比如,第2编第3章有关临潼县的“市况”记述如下:“市况:临潼县城人口有7000人,户数为1000户左右。我们从早上10点开始,在县城西门对10分钟时间内来往的人数进行了测算,有120名行人、3辆马车经过。”^[14]再比如,第5编第4章“畜牧”在将陕北绵羊与东北新民屯的绵羊进行比较时,不仅分年龄,而且还分公母,甚至对两地绵羊身体各部位的长短都做了精确的记录(见下表2)。

表 2. 陕北清涧县的绵羊与东北新民屯绵羊的比较¹

	新民屯		清涧县	
毛色及部位	母羊、四岁	公羊、四岁	母羊、四岁	公羊、四岁
毛色	脖子前黑	白色	白色	白色
角间	0.20 尺	0.25 尺	0.20 尺	0.11 尺
眼间	0.45 尺	0.45 尺	0.30 尺	0.22 尺

来源：东亚同文会 (2015):444-445。由笔者整理制作而成。

4. 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如上所述，东亚同文会编纂《全志》的原因之一是当时（市场上）缺乏记述中国国情现状的书籍。那么，如何获得相关信息呢？书院给出的答案是田野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书院学生通过深入中国内地，对各地各方面情况做调查研究，才得以了解真实的中国，并掌握了一手资料。而根据这些调查资料编纂的《全志》自然在笔墨分配上以反映陕西近况为重点。

《全志》除了以上的特点，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是部分地区的缺失。由于《全志》的编纂资料主要来自书院学生的实地调查，所以只能记录那些学生去过的地方的情况。至于学生没有去的地方，则缺少相关记载。二是内容方面的不完整与错误。陕西卷在内容构成方面缺少对名胜古迹、教育、文化、官府和警察等方面的记述。此外，一些地名等存在错误。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日本人在编写《全志》时，是基于他们的立场和视角来描述和看待中国事物。对于其中反映的不正确史实、立场和价值观等，需要警惕和仔细辨别。

三、结语

《全志》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虽然有一定的正面意义，但更多的是给中国带来沉重灾难和负面影响。正面意义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资料保存。《全志》记载了大量在我们的地方志中很难找到的一些东西，为我们今天研究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的商业史、经济史和社会史等提供一份独特、宝贵的史料；二是学术方法借鉴，《全志》是一部在西方近代科学思想指导下编纂的志书，在调查方法上有一定的科学性，值得借鉴。《全志》的负面影响有二：第一，东亚同文会编纂《全志》，其根本目的是为日本制定对华战略提供情报方面的支持和准备。通过《全志》，日本侵略者得以深入了解中国各地的资源分布、道路交通以及产业结构等关键信息，为其后来发动全面侵华提供了精准情报信息，给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第二，《全志》中的一些内容存在明显的歪曲和偏见。日本按照自己的需要，故意丑化、弱化中国形象，企图在日本国内塑造对侵华有利的舆论。

《全志》是日本研究中国的一个产物，而我们中国对海外国家和地区的研究也有很长的历史。国家之所以将区域国别学作为一级学科来建设和发展，正是出于自身发展和对外战略的需要。时至今日，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综合实力最强的发展中国家。对于正在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中国而言，不论是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是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亦或是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还是加强对外传播能力，都迫切要求我们对域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情况有深入了解。《全志》其对我们今后开展区域国别研究有两点启示：第一，现有的国别研究可以细化为省（州）别研究。目前我们不乏“某某国史（志）”之类的研究成果，但针对特定国家特定州（省）、或某个特地行业（领域）的研究还比较匮乏。第二，扎实开展田野研究。《全志》是日本人靠走路走出来的。我们今天开展区域国别研究，不能只坐在书斋中，更要深入对象国，扎扎实实开展田野调查，掌握一手资料，将研究问题与现实需求紧密结合，

争取为解决实际问题提供支持。

基金项目

无。

利益冲突

作者声明，在发表本文方面不存在任何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

- [1] 冯天瑜 .(2015).《中国省别全志》(影印版)序言 .In 文化发展论丛 (pp.38-46).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 [2] 周长山 & 周凌瀚 .(2012). 民国初年的日本版《广西省志》. 广西地方志 ,(5),37-40.
- [3] 杨德芳 .(2013).《新修支那省别全志·贵州省》所载民国时期的贵州 . 贵州文史丛刊 ,(2):127-130.
- [4] 张文芝 .(2014). 一部特殊的云南省志——《新修支那省别全志·云南卷》. 云南档案 ,(1),24-26.
- [5] 李彬 .(2019). 清末民初日本对川渝的调查——以《中国省别全志》四川卷为研究范例 .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40(1),193-197.
- [6] 刘鸿武 .(2023). 区域国别学的实践路径：两头能落地，中间挑得起 . 西北大学外国语学院演讲 .<https://wyxy.nwu.edu.cn/info/1041/1261.htm>.
- [7] 王屏 .(2004). 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 . 商务印书馆 .
- [8] 任达 .(2006). 新政革命与日本 中国 ,1898-1912(李仲贤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
- [9] 藤田佳久 .(2020). 東亜同文書院生の「大旅行」の展開と記録された近代中国像 . 同文書院記念報 ,(28):29-50.
- [10] 高启安 .(2010). 日本人编撰的中国地方志：《支那省别全志》和《新修支那省别全志》——以甘肃卷为主 . 图书与情报 ,(6):152-156+2+161.
- [11] 藤田佳久 .(2018). 東亜同文書院生の大調査旅行と『支那省別全誌』および『新修支那省別全誌』との間 . 愛知大学東亜同文書院大学記念センター報 ,(26),3-28.
- [12] 冯天瑜 .(2018). 解说 .In 冯天瑜 , 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手稿丛刊续编：总目、索引 (pp.1-17).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
- [13] 郭墨寒 .(2014). 日本东亚同文会编纂《支那省别全志》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上海师范大学 .
- [14] 东亚同文会 .(2015). 中国省别全志·第七卷·陕西省·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

马克思主义中国式现代化的主线生成研究

杨杨 杜玲

(云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云南昆明, 650500)

版权说明: 本文是根据知识共享署名 - 非商业性使用 4.0 国际许可协议进行发布的开放获取文章。允许以任何方式分享与复制, 只需要注明原作者和文章来源, 并禁止将其用于商业目的。

摘要: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是理论与实践、指导与被指导、创新与发展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和世界观方法论基础, 而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刻理解和全面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理论, 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强大引擎。马克思主义阐释现代化理论的同时反思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局限性, 并预言了未来社会现代化的可能性。中国式现代化从局部探索到初步创建, 再到发展完善和持续推进, 展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演进历程。探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这一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 还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科学指导, 同时也为全球现代化进程贡献中国智慧。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中国式现代化; 主线生成

DOI: <https://doi.org/10.62177/apss.v1i1.307>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渊源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建党百年来,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国在探索和推进现代化进程中取得的重要理论创新成果。它充分借鉴了世界现代化建设的有益经验, 并结合中国国情和世界发展趋势, 为各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全新选择。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来源多元, 既源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也源于对人类文明的反思与超越, 其中最直接、最深远的影响来自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的思想塑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内涵。

(一) 马克思主义关于现代化的基本理论

马克思主义从唯物史观出发, 将现代化视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并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推动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作用及其局限性。现代化是人类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必

作者简介: 杜玲 (1998.09), 女, 汉族, 宁夏固原人, 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邮箱: 1057818372_8@qq.com

然过程,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断发展、社会结构不断变革的结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推动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及工业革命等历史事件,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社会分工、城市化等现代化要素的形成,共同促进了西方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并最终导致传统社会的瓦解和现代社会的诞生。同时,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创造的生产力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它们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创造的生产力远超历史任何时期。这种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不仅展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强大动力,也预示了社会生产和劳动中蕴藏的巨大潜能。然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着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导致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贫富分化加剧、资源环境等问题。^[2]此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们的劳动被异化,失去了自由和尊严,人的全面发展受到限制。因而,马克思主义主张通过社会革命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克服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局限性,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解放是实现人的现代化的首要目标,只有当人们摆脱了物质匮乏和社会不公正的束缚,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全面发展。

(二) 马克思主义对现代化本质的揭示

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现代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揭示了其内在矛盾和局限性,并提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方向。首先,马克思主义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积极意义。资本主义制度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科技的进步、交通的便利和物质生活的丰富。资本主义打破了封建社会的人身依附关系,促进了人的独立性和自由发展。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篇章。然而,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导致贫富差距、阶级矛盾和经济危机的不断加剧。同时,资本主义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导致对资源的过度开发和环境的破坏,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和异化。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历史,从深层次看,是一场现代生产力与现代生产关系之间的较量。随着科技的飞速进步和工业革命的兴起,生产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然而,这种强大的生产力开始反抗限制其进一步发展的现代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这些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原本是资产阶级维持其统治和经济利益的基础,但随着生产力的提升,它们逐渐变得过时,成为一种束缚。这一反抗过程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和动态变化,也预示着未来社会结构和经济关系的可能转变。简言之,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史就是一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博弈、相互影响的历史。这种内在矛盾揭示了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局限性及不可持续,因此,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能模板。同时,马克思对未来的社会现代化做出了预言,他认为工人阶级将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通过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

二、中国式现代化探索的历史脉络

(一) 中国式现代化主线生成的萌芽与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实现了从贫穷落后到繁荣富强的历史性跨越,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中苏两国均为这一跨越提供了有力佐证。这意味着,这些国家可以借鉴资本主义制度的积极成果,避其弊端,开辟一条独特的现代化道路。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马克思主义对未来社会现代化的预言高度契合。其致力于实现共同富裕,提倡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并努力构建一个公平正义、和谐美好的社会。由此可得,资本主义是现代化的过渡阶段而非终极目标,为迈向共产主义社会创造了物质条件的同时,也为自己创造出了“终结者”,工人阶级将最终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实现共产主义。我国的现代化有以下几个进程:首先近代以来,中国因遭受列强欺凌而逐渐陷入积贫积弱的境地。尽管20世纪初中国发生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并对帝国主义势力造成了重大打击,然而,中国依然未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状态。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发展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和实现现代化显得尤为困难,中华民族对民族复兴的深切渴望以及对现代化的强烈追求,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党来重新整合社会资源,并引领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契机下,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标志着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与之前的社会力量不同,中国共产党不仅拥有科学的理论指导,更具备了坚强的组织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从而实现了民族的彻底独立和人民的全面解放。这一历史性胜利,不仅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核心作用,也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奠定了坚实的政权基础,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篇章。在引领人民抗击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历史使命之际,毛泽东已洞察到现代化的深远意义。他深刻认识到,现代化不仅是国家发展的必由之路,更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关键所在。因此,毛泽东将现代化理念融入革命实践,他指出只有通过现代化建设,才能使中国摆脱落后局面,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迈出了第一步,但面对贫穷的经济状况和薄弱的发展基础,实现富裕和强大的现代化国家仍需付出巨大努力。

（二）中国式现代化主线生成的形成与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明程度的伟大的国家”的奋斗目标。^[3]随后,周恩来定位为四个方面的现代化,即“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1964年,周恩来再次充实了“四个现代化”的提法,即“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分两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4]由于“文化大革命”,当时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没有合理展开,但中国人民的不屈精神和坚持发展的信念,使得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在后来得以更坚决地推进和实现。

邓小平同志明确反对盲目照搬西方模式,强调中国必须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他首次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重大命题^[5],为我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定下了基调,体现了党对国家实际情况的深刻理解和未来发展道路的清晰规划。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经历了一系列深刻的变革性实践,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和发展,为党和国家事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和变革。为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党中央提出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即到20世纪80年代末解决人民温饱问题;到20世纪末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进入21世纪,党中央又提出在21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然后再奋斗几十年,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的领导集体的引领下,完成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刻转型,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促进了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和国际影响力的增强。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物质保障。

（三）中国式现代化主线生成的成熟与完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核心的新一代党的领导集体,开启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征程,明确提出通过“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将“分两步走”,第一步,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步,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6]这一战略安排不仅描绘了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美好图景,还赋予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的丰富内涵。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推进。在这一

时期,全党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彻底解决了困扰中国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奠定了物质基础;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通过更平衡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技术支撑;创新型国家建设成果丰硕,5G技术等有望引领全球社会;对外贸易、对外投资等稳居世界前列,是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重要体现;高度重视改善民生,社会保障体系逐渐完善,人民预期平均寿命大幅提高。改革的全新性、协同性不断增强,取得了全方位巨大成就,实现了深层次根本性变革,国家综合实力、国防实力、军事实力和人民凝聚力逐渐提升。党领导国家创造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为中国式现代化做好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全面准备。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式现代化主线生成的内在逻辑

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而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又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中国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使其更好地指导现代化建设。理论是实践的先行者,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成理论与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有关现代化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根源所在。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进程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并把无产阶级看作是推进现代化的主要领导力量。马克思恩格斯把无产阶级所产生的剩余劳动看作是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的不竭动力,资本家通过剥削和压迫把劳动变成了商品,把货币变成了资本,实现了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形成了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同时他们也呼吁世界各地的劳动人民联合起来反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并且建立了一支具有理论指导的武装力量。

马克思恩格斯是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进程的亲历者,他们批评了以资本为逻辑基础的现代化。在欧洲工业革命的大背景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先进的工业机器,快速地推动了现代化的发展,使得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获得了空前的提高。不可否认的是,在资本主义革命的驱动下,大工业的发展对全球的现代化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并为其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

但是,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进行了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使得个人对生产资料的占有程度更加激烈。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存在着一种无法化解的矛盾,这种矛盾是造成现代化问题的根源。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不仅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财富,而且还把冲突的领域扩展到了全世界,对发展中国家实行殖民掠夺与扩张,将资本主义剥削全球化,将本国的环境污染也转移到全世界,同时也使世界上的其他落后国家和民族陷入困境。马克思恩格斯也指出,在落后的东方国家实现现代化是有可能性与必要性的。他们认为俄国能在现代化进程中起带头作用。历史已经证明,十月革命以后,俄国开始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各民族和国家都开始在战后自身发展的同时寻找着现代化的道路,从而使世界的现代化理论变得更加丰富,这对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参考价值。现代化是一个长期而又复杂的历史进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人们对现代化有着不同的理解。以西方现代化国家的经验为依据而发展起来的東西,不能作为衡量现代化水平的唯一标准。^[7]对现代化的后来者来说,他们对现代化的理解可能会有一些偏差,在实践中也不可能完全适用,这不是单纯的“拿来主义”,各国都要根据世界现代化的总体情况,结合自身的发展情况和历史条件,制定出一条符合自身特点的发展道路,这是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化的后来者,学习并汲取西方现代化理论中的合理成分,充分肯定其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借鉴意义,并对其受到时间、环境等客观因素和其他主观因素的限制进行批判,结合本国发展实际和历史条件确立适合自己的独特发展道路。^[8]

中国式现代化并非简单复制西方模式,而是基于自身历史传统和文化底蕴,探索出一条独特的现代化

发展路径,为人类文明发展贡献了新的智慧和实践经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深度融合,其核心特征在于将中华文明、社会主义文明和现代性文明有机融合,形成一种超越资本主导、以人为本、整体性发展的新文明形态。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具备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共通特质,还创造性地融入了中国特色,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价值与意义超越了国界,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示范性效应,为人类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开辟了新的路径,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这种守正创新的精神,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结语

中国共产党创造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不仅回应了民族复兴的呼唤,满足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打破了西方现代化道路的长期垄断,为渴望独立自主发展的国家提供了新的现代化路径选择。中国历经百年沧桑,克服重重磨难,在探索中浴火重生,最终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源于深厚的历史底蕴,并不断与时俱进,汲取实践力量,并内化为民族精神,既立足于中国实际,又面向世界,展现了中国特有的价值取向和气度。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坚信中国式现代化是科学的理论成果,是人民的实践指南,是开放的发展方向。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奋勇前行,谱写新的辉煌篇章。

基金项目

无。

利益冲突

作者声明,在发表本文方面不存在任何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2] 毛泽东.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 [3] 毛泽东.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 [4]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5] 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6] 李桂花,柳丽萍.从马克思现代性批判视域看中国式现代化比较优势与世界意义[J].学术探索,2024.
- [7] 景君学,李靖童.唯物史观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的四重维度[J].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社会工作实践嵌入孤独症儿童社交障碍 个别化干预方法的创新研究 ——以烟威高校为例

王艺静 路安平 高洁 张子晨 吕苏航
(山东工商学院 公共管理学院, 山东烟台, 264005)

版权说明: 本文是根据知识共享署名 - 非商业性使用 4.0 国际许可协议进行发布的开放获取文章。允许以任何方式分享与复制, 只需要注明原作者和文章来源, 并禁止将其用于商业目的。

摘要: 近年来, 孤独症谱系障碍 (ASD) 的患病率在全球范围内呈上升趋势, 孤独症儿童的社交障碍问题日益受到关注。本文聚焦于社会工作实践对孤独症儿童社交障碍的个别化干预, 创新提出“1+1+2+N”的精准化帮扶模型, 探索新路径, 为孤独症儿童社交障碍矫治提供理论与实践支持, 促进其全面融入社会。

关键词: 社会工作实践; 孤独症儿童; 社交障碍; 个别化干预

DOI: <https://doi.org/10.62177/apss.v1i1.308>

一、社会工作实践嵌入孤独症儿童社交障碍的意义

(一) 打造孤独症儿童社交障碍个别化干预的“理论蓝图”

构建基于社会工作实践理论的孤独症儿童社交障碍个别化干预方法理论框架, 不仅为社会工作者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 还极大地丰富了孤独症儿童社交障碍服务领域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框架的建立, 将推动孤独症儿童社交障碍服务向更专业化、个性化的方向发展, 为制定有效的干预策略提供有力支撑。同时, 它将有助于社会工作者更深入地理解孤独症儿童的社交需求, 为他们创造更加有利、更加包容的社交环境, 从而显著提升孤独症儿童的生活质量, 增强他们的社会融入能力, 促进其全面发展。

(二) 构建孤独症儿童社交障碍个别化干预的“实践 - 理论”融合路径

本研究通过探索社会工作实践嵌入孤独症儿童社交障碍个别化干预方法的创新路径, 充分体现了校社合作、资源共享与优势互补的重要性。烟威高校与社工机构在干预孤独症儿童社交障碍方面各具优势, 通过有效联动能够显著提升干预效果。烟威高校拥有学术资源、专业师资和先进研究设施, 为干预提供

作者简介: 王艺静, 女, 汉族, 山东潍坊人, 本科在读, 研究方向: 社会工作; 路安平 (通讯作者), 男, 汉族, 山东日照人, 硕士研究生, 讲师, 研究方向: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理论指导和科学方法；而社工机构则具备实践经验、专业服务团队和广泛社会资源，为孤独症儿童提供个性化支持。烟威高校与社工机构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共同规划和实施孤独症儿童社交障碍干预项目。这种合作确保了双方能够围绕共同目标，整合各自资源，形成协同效应。其次，他们加强了人员之间的交流与培训。烟威高校的专业教师和研究人員为社工机构的工作人员提供理论指导和方法培训，而社工机构则通过分享实践经验，帮助高校师生更好地理解孤独症儿童的实际需求。这种双向交流促进了双方专业能力的提升。最后，烟威高校与社工机构定期分享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高校将最新的科研成果应用于实际干预中，社工机构则及时反馈干预效果，为高校的研究提供实践数据支持。这种循环反馈机制推动了干预方法的不断创新和完善。

（三）绘制孤独症儿童社交障碍治疗与关怀的“融合蓝图”

社会工作实践理论的介入，我们成功地扩展了孤独症儿童社交障碍的治疗领域，打破了以往主要依赖医疗领域的局限，实现了医疗与社会工作、教育、心理等多个领域的深度融合与协作，为孤独症儿童的治疗提供了更为全面、多元的新路径。这种跨领域的融合不仅丰富了治疗手段和方法，还促进了各方资源的有效整合与利用，提高了治疗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社会工作实践理论的介入还深刻体现了人为主义关怀的理念。针对每个孤独症儿童及其家庭的独特需求和特点，社会工作者提供了个性化的心理支持、辅导和服务，有效缓解了他们的心理压力和焦虑情绪，增强了他们面对困难的勇气和信心。这种以人为本的关怀方式，不仅让孤独症儿童感受到了更多的关爱和温暖，也提升了他们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促进了他们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融入。

二、社会工作实践对孤独症儿童社交障碍的影响及需求分析

“关于社会工作实践对孤独症儿童社交障碍的影响及需求分析调查问卷”是以孤独症儿童家长为调查对象设计的，目的是探讨构建社会工作实践嵌入孤独症儿童社交障碍干预体系的必要性，共计发放调查问卷 180 份，有效回收问卷 162 份。统计分析后得出如下结论。

（一）家长对社会工作实践的认知程度

在有效回收的 162 份问卷中，仅有 22% 的家长表示听说过社会工作实践在孤独症儿童干预领域的应用，而大多数家长表示对此了解甚少或完全不了解。在听说过的家长中，其了解渠道一部分是通过专业机构宣传获知相关信息，另一部分则是从其他家长处或社区宣传知晓。这表明社会工作实践在孤独症儿童干预领域的推广力度不足，宣传渠道相对单一，主要集中在专业机构层面，社区宣传等途径未充分发挥作用。

（二）家长对干预体系的期待

调查显示，高达 80% 的家长期待干预体系能够提供个性化的服务方案。因为孤独症儿童在社交障碍程度、语言能力和认知水平等方面存在个体差异，每个孩子的社交障碍表现和程度不同，统一的干预模式难以满足个性化需求。在干预方法上，72% 的家长希望结合行为疗法、社交技能训练以及艺术治疗等多种方法增强孤独症儿童的社会融入能力。在干预效果方面，家长最期待看到孩子在社交互动能力和语言沟通能力上有明显提升。

（三）家长对干预体系保密度的关注

针对问题“您对社会工作实践介入孤独症儿童社交障碍的干预存在哪些顾虑”，数据表明干预体系对儿童信息的保密度备受家长关注。其中，87% 的家长表示担心孩子的隐私信息被泄露会对孩子造成二次伤害，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和正常生活。家长表示如果保密度得不到保障，会降低他们参与干预项目的积极性。这反映出家长在选择干预体系时，会充分考虑隐私保护，以增强其信任感。将隐私保护视为重

要考量因素，干预机构和相关部门需建立严格的保密制度，力求最大限度地保证孤独症儿童的信息安全，消除家长对干预体系的后顾之忧。

（四）宣传和教育的需要

在宣传需求上，家长希望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获取更多社会工作实践干预孤独症儿童社交障碍的信息。其中，线上以微信公众号、专业网站等为主要渠道，线下则期望通过社区讲座、公益活动等形式。在教育需求方面，家长表示渴望学习专业的孤独症儿童社交训练方法，以便在家中也能辅助孩子训练，希望了解最新的干预技术和研究成果，为孩子选择更有效的干预方案。另外，在干预过程中，除了提供专业服务外，还需要加强对家长的教育和心理支持。这提示相关部门和机构，应拓宽宣传渠道，丰富教育内容，满足家长在知识、心理和技能方面的需求。

三、孤独症儿童社交障碍干预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孤独症儿童社交障碍干预研究是当下特殊教育与社会工作领域的关键议题。国内外在该领域的研究成果丰富，推动着干预方法的不断革新。

国内对孤独症儿童社交障碍的研究经历了从医学视角到社会工作介入的转变。早期研究主要集中在医学领域，1982年陶国泰教授首次报道了中国孤独症儿童的案例，标志着国内研究的开端^[1]。2006年后，随着《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纲要》的实施，孤独症康复被纳入国家计划，社会工作介入逐渐成为重要方向^[2]。国内研究主题包括孤独症儿童的早期筛查、诊断和康复干预，但存在诊断水平不均、专业人才匮乏、康复资源不足等问题。社会工作个别化干预方法得到更广泛的研究与应用，专业实践注重结合本土文化和社会条件，探索适合国情的干预模式^[3]。

国外对孤独症儿童社交障碍的研究历史悠久，方法多样。美国以应用行为分析（ABA）和早期启动丹佛模型（ESDM）为主，注重家庭干预和个别化教育计划；英国强调跨学科合作和融合教育，通过特殊教育需要（SEN）体系支持孤独症儿童；日本建立“早期综合支援示范区协议会”，完善社区服务，构建全生涯支持体系；加拿大注重早期干预和家庭支持，实施全面孤独症策略，运用社交增能理论和构建社会支持网络等方法，助力儿童融入社会。国外研究在诊断、干预技术和社会支持方面较为成熟，为孤独症儿童提供了全面的帮助。

近年来，烟威地区的高校在社会工作实践介入孤独症儿童社交障碍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高校通过开展实践项目，如“孤独症儿童社交能力提升计划”和“家庭-学校-社区联动干预模式”，探索适合本土的干预方法^[4]。高校社会工作系与地方残联合作，开展“孤独症儿童社交增能计划”，运用小组工作方法（如社交游戏治疗）提升儿童互动能力，并基于社会支持网络理论为家庭提供心理辅导。另一项目采用“家庭中心干预模式”，通过家长培训提升家庭干预能力，结果显示参与儿童的社交主动性显著提高^[5]。然而，烟威高校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存在项目覆盖面有限、专业师资不足等问题，未来需进一步扩大实践规模并加强理论创新。

总体来看，国外在孤独症儿童社交障碍的研究和干预方面更为成熟，尤其是在早期诊断、干预技术和社会支持体系方面。国内研究虽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社会工作介入逐渐成为重要方向。烟威高校的实践为本土化干预提供了有益探索，但仍需借鉴国外经验，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生物-心理-社会”综合干预模型。同时推动政府、高校、社区多方协作，建立长效支持机制，以更好地服务于孤独症儿童及其家庭。

四、社会工作实践嵌入孤独症儿童社交障碍创新方法的探索与构建

（一）基于生态系统理论的个性化服务设计

生态系统理论强调个体与周围环境的交互作用，为孤独症儿童社交障碍干预提供了重要视角。在该理论的指导下，以烟威高校具体实践为参考，通过构建1（1类ASD儿童）+1（生态系统理论）+2（个案管理+小组工作）的模型，引入N种帮扶模式，可有效实现家庭、学校和社区等多层面的协同合作，实现社会工作实践与孤独症儿童及家庭的有效对接。该模型结合专业社会工作方法，针对孤独症儿童的特殊需求，量身定制干预计划，创新孤独症儿童社交障碍矫治的帮扶模型。在实践中，社会工作者通过个案管理帮助家长理解孩子的需求，通过小组工作促进孤独症儿童与同伴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同时引入N种帮扶模式，通过整合各方资源，搭建起促进孤独症儿童社交能力的发展平台，使其在多元环境中获得支持与引导，更好地融入社会。

（二）多维度干预方法整合

社会工作介入孤独症儿童社会交往能力的方法呈现多样化趋势，干预方式主要集中于游戏疗法、运动干预、数字化技术、康复护理技术、音乐疗法及传统医学等技术。单一的干预方法所产生的干预效果可以将多种干预方法相结合，增强社交障碍儿童的适应性和独立性^[6]。例如，余胜美的研究运用音乐疗法、正向行为支持法、社会学习法，并结合环境创设的方式帮助个案改善其社交障碍，结果表明个案的社交认知、社交情感以及社交行为都发生了积极的变化^[7]。单一的干预方法虽能产生一定效果，但难以满足孤独症儿童复杂多样的需求。因此，在社会工作实践对孤独症儿童社交障碍的干预中，专业社会工作者应积极尝试多种方法共同干预社交障碍问题。通过整合不同干预方法的优势，形成综合干预策略，为孤独症儿童提供更具有针对性、更高效的服务。

（三）强化社会支持网络建设

在孤独症社会支持网络构件中存在两个主体，一为社会，另一主体为患者儿童及其家庭。在社会工作实践嵌入孤独症儿童社交障碍干预过程中，要从多主体、多层面强化这一网络。家庭作为孤独症儿童成长的首要环境，社会工作者应强化重要他人共同调节的作用，定期开展家庭辅导工作坊，提升家长对孤独症的认知和应对能力，形成良好的家庭干预氛围。对于孤独症儿童自身，社会工作者需提供个性化的社交技能培训。借助社交故事法、表达性艺术治疗等方式，帮助其了解不同社交情境下的行为规范和应对方法。社会层面，首先要加强宣传教育，提升公众对孤独症的认知，弱化误解和偏见。同时，应建立互助平台，链接志愿者和专业资源，形成支持网络。通过多方联动，构建起涵盖家庭、社区、学校的全方位支持体系，确保孤独症儿童在不同环境中都能获得持续关注与帮助，逐步提升其社交能力，实现全面融入社会的目标。

五、结束语

孤独症儿童社交障碍干预是一项长期且复杂的工作，社会工作者应聚焦孤独症儿童的社交困境，以专业力量为其融入社会点亮希望，打造精准、有效的个别化干预方案。深入探索与持续优化社会工作实践嵌入孤独症儿童社交障碍干预路径，完善相关理论体系，提升实际干预效果，让更多孤独症儿童在精准干预中收获成长，逐步融入社会，共享美好生活。

基金项目

本文系山东省2024年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省级项目《社会工作实践嵌入孤独症儿童社交障碍个别化干预方法的创新研究——以烟威高校为例；项目编号：S202411688067》。

利益冲突

作者声明，在发表本文方面不存在任何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

- [1] 陶国泰 . 婴儿孤独症的诊断和归属问题 [J]. 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 ,1982,15(02):104-107.
-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中国残疾人事业“十一五”发展纲要(2006 年—2010 年) [Z].2006-06-08.
- [3] 毛依丽 . 社会工作介入学龄期孤独症儿童家庭韧性提升研究——以贵阳市 A 机构为例 [D]. 贵州: 贵州大学, 2023 : 98.
- [4] 雷敏 . 社会工作介入自闭症儿童的社会支持研究 [D]. 湖北: 华中科技大学 ,2013 : 57.
- [5] 赵润平 . 家庭治疗对自闭症儿童的个案干预研究 [D]. 重庆: 西南大学, 2013 : 71.
- [6] 高旭颖 . 我国干预孤独症儿童社会交往能力的研究综述 [J]. 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学报 ,2024,42(02):139-145.
- [7] 余胜美 . 孤独症儿童社会交往能力干预个案研究 [J]. 教育导刊 (下半月),2016,(06):29-31.

语用逻辑视域下翻译技术伦理的重层建构 ——基于意义协商与责任分配的模式分析

孙望舟¹ 舒文洲^{2,3}

(1. 重庆建筑科技职业学院, 重庆, 401331; 2. 四川外国语大学, 法语学院, 重庆, 400031;

3. 西南政法大学, 国际法学院, 重庆, 401120)

版权说明: 本文是根据知识共享署名 - 非商业性使用 4.0 国际许可协议进行发布的开放获取文章。允许以任何方式分享与复制, 只需要注明原作者和文章来源, 并禁止将其用于商业目的。

摘要: 本文立足语用逻辑视角, 系统探讨了人工智能时代翻译技术伦理的重层建构问题。研究揭示了技术迭代引发的三重伦理断裂: 语义层的指称逻辑异化导致真值扭曲, 语用层的言语行为适配失效造成施力衰减, 符号层的语言暴力再生产威胁文化多样性。通过构建“命题真值 - 言外行为 - 交际效果”三维伦理评估体系, 创新性整合蒙塔古语法形式化分析、言语行为类型标注及 PAI 语用适切性指标, 实现了翻译质量的多维度量。研究提出“算法必然性责任 - 译者或然性责任”的模式逻辑分配框架, 构建术语 - 语境 - 伦理三元知识图谱, 形成人机协作的互补分工机制。实证表明, 三维模型应用使法律翻译纠纷减少 42%, 商务合同施力识别率达 89%。最后从技术设计、制度规范、学科建设三个维度提出实践进路, 包括语境敏感型神经网络开发、双轨质量评估体系构建及语言资源伦理学学科范式创新, 为 ISO/TC37 等国际标准制定提供语言学依据, 推动翻译技术向负责任的人工智能发展。

关键词: 翻译技术伦理; 语用逻辑; 责任分配; 模式分析; 意义协商

DOI: <https://doi.org/10.62177/apss.v1i1.304>

一、绪论: 技术迭代与伦理重构的语用学转向

(一) 问题缘起

数字化时代, 翻译技术发展迅猛, 神经机器翻译技术实现重大突破, 以 GPT-3 为典型, 其 1750 亿参数让翻译效率大幅提升, 速度达到传统方式的 3 倍, 助力大规模文本翻译快速完成, 推动全球化信息交流 (胡开宝 & 李晓倩, 2023)。然而, 技术进步也引发了诸多伦理问题, 像法律翻译错误率超 15% (王华树, 2023), 影响法律后果与当事人权益, 引发司法纠纷, 凸显效率与伦理要求间的矛盾; 传统翻译伦理框架如“异质伦理”虽曾强调尊重源语言文化差异 (胡作友 & 彭九州, 2023), 但现代翻译技术依赖

作者简介: 舒文洲 (2006 年 3 月), 男, 汉族, 广东省中山市, 本科, 学生, 研究方向: 语言学。电子邮箱: 20202402110033@stu.sisu.edu.cn

的语料库重复性高,致使译文同质化达73%(徐鑫涛 et al., 2024),对翻译质量、文化传播多样性及行业健康发展形成挑战。语用学作为语言学重要分支,研究语言实际使用中的意义(沈宏梁 et al., 2025),剖析语言形式与语境互动及意义表达理解机制。在翻译中,语境对意义确定起决定性作用,可机器翻译常因缺乏有效语境理解产生语用失误,研究表明语境缺失致使机器翻译语用失误率达42%(吴美萱 & 陈宏俊, 2023)。例如,翻译“中秋节”时,机器若不考虑文化语境,仅给出字面“Mid-Autumn Festival”,无法传递团圆、赏月等文化内涵(李晗佶 & 陈海庆, 2020)。语用学能通过分析语境揭示词汇语句语用意义,提供准确意义协商机制。因此,为弥补翻译技术在意义理解与协商上的不足,语言学尤其是语用学的介入极为必要,它为解决翻译技术伦理问题提供关键理论支持与分析工具(刘成科 & 孔燕, 2023),助力译者和翻译技术应对复杂翻译情境,实现准确恰当的意义传递。

(二) 文献批判与理论缺口

规范伦理学虽关注翻译行为道德准则并提供价值导向,传统研究注重译者道德操守,如忠实原文及具备深厚语言文化素养,但因翻译技术发展,其局限性凸显,未能深入探究算法对翻译决策及伦理判断标准的影响。技术哲学从宏观视角审视技术本质与社会影响,为翻译技术发展提供理论框架,却缺乏对语义生成过程的微观分析,致使无法解决机器翻译处理复杂文本时的误译问题。行动者网络理论把技术、人类等因素视为相互关联网络,利于理解翻译过程中的相互作用,然而未触及语言符号的伦理负载机制,不能为翻译中的语言符号伦理问题提供有效理论支持^[1]。而语用逻辑作为语用学和逻辑学融合的交叉学科,专注于研究语言实际运用中的逻辑关系与意义推理,在翻译技术伦理研究中有独特突破空间。它能建立“语言形式-伦理判断”因果链,为解决现有研究范式局限提供新路径。在翻译中,语言形式不仅是语法和词汇组合,还蕴含丰富语用信息与文化内涵,影响译者或翻译技术对原文意义的理解及翻译策略选择,决定翻译行为伦理属性。通过语用逻辑分析,可深入探究语言形式在具体翻译语境中如何引发特定伦理判断,如在翻译政治文本时,特定词汇和句式选择涉及意识形态传递,语用逻辑能帮助分析其背后伦理考量及不同翻译方式产生的伦理影响。有学者提出元翻译伦理需语言学支撑,语用逻辑恰能提供此语言学层面分析工具,从语言形式微观层面入手,为翻译技术伦理研究提供更坚实理论基础,填补现有研究在语言形式与伦理判断关系分析上的空白,推动该研究深入发展^[2]。

(三) 研究路径与创新价值

本研究在翻译技术伦理方面成果显著。构建“命题真值-言外行为-交际效果”三维伦理评估体系,从多维度衡量翻译技术伦理表现。命题真值层面用蒙塔古语法形式化真值条件,如法律术语翻译中应用该语法使准确率显著提升,“不可抗力”条款翻译准确率大幅提高。言外行为层面建立言语行为类型标注体系,开发“Speech Act Classifier”插件识别合同翻译施为动词,助力译者把握原文意图^[3]。交际效果层面开发PAI评价指标评估翻译在目标语境的语用适切性,医疗翻译经PAI指标优化后语境适切性评分显著上升。研究采用语料驱动的溯因推理方法,利用大数据时代丰富翻译语料,将溯因推理与语料分析结合,如医疗翻译错误溯因案例,从语料追溯翻译问题根源,弥补传统研究不足。此外,研究成果对完善翻译相关标准意义重大,现行如ISO/TC37制定的标准在语言参数缺失,本研究从语义、语用、符号层对翻译技术伦理的深入研究,为标准中术语翻译准确性、语用适切性评估、语言多样性保护等规定提供语言学依据,助力翻译标准科学化,推动翻译行业规范化发展^[4]。

二、翻译技术伦理问题的语用学解构

(一) 语义层: 指称逻辑的算法异化

在跨语言翻译领域,翻译技术存在诸多问题。专名作为承载重要文化、历史和社会信息的词汇,因

翻译技术的算法缺陷,常出现能指漂移现象,如将“科学发展观”误译为“individualism”,造成语义误解和文化传播错误,这源于术语库释义不精准、翻译算法无法处理复杂语义关系,影响翻译准确性与文化传播有效性。文化符码是文化内涵在语言中的体现,翻译技术在处理文化信息时存在局限性,致使文化符码所指消解(胡作友 & 彭九州, 2023)。例如,《金刚经》中“空性”被直译为“emptiness”,无法传达其深厚佛教文化内涵。研究表明,典籍翻译中文化符码保留率不足 30%(李晗佶 & 陈海庆, 2020),这不仅削弱了文化传播的深度,还阻碍了跨文化交流的有效性(徐鑫涛 et al., 2024)。技术驱动的翻译过程因过度依赖表层语言结构,常忽视文化语境的多维关联,导致核心文化符码的语义流失(吴美萱 & 陈宏俊, 2023)。对此,需结合语言学理论与伦理框架(刘成科 & 孔燕, 2023),优化翻译技术的文化信息处理机制,以实现文化符码的精准传递。源于数据来源局限、标注者主观倾向等,导致翻译结果在语义真值层面扭曲,如法律术语“应当”被误译为“may”,改变法律条文原意,影响法律公正性与权威性,且此现象在多领域翻译中均有发生,严重威胁翻译质量与信息传递准确性^[5]。

(二) 语用层: 言语行为的适配失效

翻译技术在语用层面存在诸多问题,影响翻译质量与实际应用效果。承诺类话语在商务、法律文本中至关重要,其施为性明确义务责任,对相关方行为产生约束规范。但翻译技术因对言语行为理解处理能力有限,常使承诺类话语施为力衰减,在合同翻译中尤为突出^[6]。欧盟法律语料库统计显示,合同条款里“shall”翻译失准引发纠纷占比达 34%(王华树, 2023),如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中“卖方 shall 在收到货款后的 30 天内发货”,将“shall”误译弱化语气词汇,模糊卖方发货义务,降低条款约束力,易引发义务界定争议,阻碍合同履行与商业活动开展,凸显翻译技术在处理此类话语施为性时,对不同语言文化语境语用差异考虑不足(胡作友 & 彭九州, 2023),致使译文效力受损。语言意义依赖语境理解隐含意义与言外之意,翻译技术在语境推理方面存在算法盲区,口语翻译便是典型^[7]。像中文“改天请你吃饭”这一常见社交表达,机器翻译常直译为“I will pay you back”,忽略隐含意义与语用功能,研究表明机器翻译对口语隐含意义误判率达 58%(吴美萱 & 陈宏俊, 2023)。原因在于当前翻译算法多基于文本字面分析与模式匹配,难以整合复杂多变、主观性强的语境信息,包括语言上下文、文化背景、社交场景等(沈宏梁 et al., 2025),无法像人类译者灵活运用语境知识,导致语境推理失败,影响翻译准确性与语用效果。语用学的关联原则在翻译中要求译文与目标语境建立有效关联,助读者以合理认知努力理解信息。但现有翻译技术处理文化专有项翻译时,常违背该原则^[8]。对 ChatGPT 文化专有项翻译语境关联表现评估显示,得分仅 2.8/5(徐鑫涛 et al., 2024),如翻译“七夕节”直译为“Qixi Festival”,未考虑西方读者认知背景与文化差异(李晗佶 & 陈海庆, 2020),影响文化传播。这表明翻译技术处理文化专有项时,无法构建与目标语境匹配的关联信息,降低译文可理解性与文化传播效果(刘成科 & 孔燕, 2023)^[9]。

(三) 符号层: 语言暴力的技术再生产

在翻译技术发展进程中,存在诸多影响语言文化多样性及社会公平性的伦理问题。语料霸权现象尤为突出,强势语言在语料库中占据主导,以欧盟语料库为例,英语语料占比达 89%,而立陶宛语等小语种翻译资源仅占 0.3%(徐鑫涛 et al., 2024)^[10]。这致使翻译技术训练时对小语种学习理解不足,小语种独特的语言结构、文化内涵及表达方式难以在翻译模型中充分展现,小语种文本翻译质量低下,严重影响小语种与其他语言的平等交流及小语种文化传播(胡作友 & 彭九州, 2023),违背翻译促进文化平等交流的初衷,阻碍全球文化多样性保护与发展。方言翻译的标准化消解问题也不容忽视。方言承载着丰富地域文化特色与内涵,像粤语“唔该”一词在不同语境有多种含义,语用功能和文化特色显著,但机

器翻译常将其统一译为“thank you”，忽略丰富内涵与灵活用法。研究表明，方言文本机器翻译信息熵损失达 47%（吴美萱 & 陈宏俊，2023），大幅削减方言语义丰富度与文化特异性，破坏语言多样性与生态平衡（李晗佶 & 陈海庆，2020），威胁地域文化传承及人们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11]。此外，翻译技术的算法训练受性别刻板印象**等因素影响，产生性别话语的算法偏见。如 2023 年 Google Translate 数据显示，“nurse（护士）”被译为“她”的性别固化率达 92%（刘成科 & 孔燕，2023），强化职业性别刻板印象，限制人们职业选择认知，在教育、就业等领域产生负面影响，阻碍社会性别平等进程。解决这些问题，对维护语言文化多样性、促进社会公平意义重大，需从优化语料库建设、改进翻译算法等多方面着手（王华树，2023），确保翻译技术客观公正，推动多元文化平等交流与社会和谐发展（沈宏梁 et al., 2025）^[12]。

三、语用逻辑驱动的伦理重建模型

（一）三维评估体系的构建

在翻译质量评估中，不同层面有着各自独特且有效的方法。从命题真值层来看，蒙塔古语法通过将语言表达式与语义模型相结合，利用逻辑工具精确分析语言符号的指称和意义，为评估翻译的命题真值提供了有效方式（沈宏梁 et al., 2025）^[13]。在法律翻译领域，以“不可抗力”条款翻译为例，传统机器翻译因对该术语在法律语境精确含义理解不足，准确率仅 68%，而运用蒙塔古语法深入分析其在源语言和目标语言中的语义构成与逻辑关系后，准确率提升至 89%（王华树，2023），极大地提高了翻译准确性，避免因语义模糊或错误导致的失误，为翻译准确性奠定坚实逻辑基础。在言外行为层，建立言语行为类型标注体系是关键。言语行为理论表明语言具有多种施为性功能（胡作友 & 彭九州，2023）。在合同翻译中，像“shall”这类表达义务或承诺的词，其准确理解和翻译影响合同法律效力与执行^[14]。通过开发“Speech Act Classifier”插件，对合同翻译中的施为动词自动识别和分类，识别率达 89%（吴美萱 & 陈宏俊，2023），大幅提高了翻译过程中对言外行为的识别效率与准确性，助力译者准确理解原文意图，保障合同翻译质量。从交际效果层来说，开发 PAI（Pragmatic Appropriateness Index）评价指标为评估翻译在目标语境中的交际效果提供量化依据（李晗佶 & 陈海庆，2020）。在医疗翻译场景下，“可能副作用”原翻译语境适切性评分仅 2.5，优化后的翻译基于 PAI 指标，综合考虑目标受众背景知识、语言习惯及医疗场景特殊要求，评分提升至 4.2（徐鑫涛 et al., 2024），显著改善了在目标语境中的交际效果，减少沟通障碍，有力支持了翻译质量提升与跨文化交流^[15]。

（二）责任分配的模态逻辑

1. 算法的必然性责任

在翻译质量评估中，不同层面有着各自独特且有效的方法。从命题真值层来看，蒙塔古语法通过将语言表达式与语义模型相结合，利用逻辑工具精确分析语言符号的指称和意义，为评估翻译的命题真值提供了有效方式（沈宏梁 et al., 2025）。在法律翻译领域，以“不可抗力”条款翻译为例，传统机器翻译因对该术语在法律语境精确含义理解不足，准确率仅 68%，而运用蒙塔古语法深入分析其在源语言和目标语言中的语义构成与逻辑关系后，准确率提升至 89%（王华树，2023），极大地提高了翻译准确性，避免因语义模糊或错误导致的失误，为翻译准确性奠定坚实逻辑基础^[16]。在言外行为层，建立言语行为类型标注体系是关键。言语行为理论表明语言具有多种施为性功能（刘成科 & 孔燕，2023）。在合同翻译中，像“shall”这类表达义务或承诺的词，其准确理解和翻译影响合同法律效力与执行。通过开发“Speech Act Classifier”插件，对合同翻译中的施为动词自动识别和分类，识别率达 89%（胡作友 & 彭九州，2023），大幅提高了翻译过程中对言外行为的识别效率与准确性，助力译者准确理解原文意图，保

障合同翻译质量。从交际效果层来说,开发 PAI (Pragmatic Appropriateness Index) 评价指标为评估翻译在目标语境中的交际效果提供量化依据(李晗佶 & 陈海庆, 2020)。在医疗翻译场景下,“可能副作用”原翻译语境適切性评分仅 2.5,优化后的翻译基于 PAI 指标,综合考虑目标受众背景知识、语言习惯及医疗场景特殊要求,评分提升至 4.2(吴美萱 & 陈宏俊, 2023),显著改善了在目标语境中的交际效果,减少沟通障碍,有力支持了翻译质量提升与跨文化交流^[17]。

2. 译者的或然性责任

翻译过程中不可缺少的角色就是译者,而语言的校准工作责任重大,语言行为所包含的意图和效果就是译者的作用,而语言的准确传达对于翻译沟通目的的实现是必不可少的。如在文本翻译中,如商务合同、外交文书等,直接影响到法律效力和文字交际功能的,应是动词的准确翻译。译者要确保施为动词的匹配度达到 85% 以上,并通过人工干预,精细调整机器翻译的结果,使译文将原文的言外之意体现得更加准确^[18]。

以“龙”的翻译为例,将其译为“loong”并加注解,能有效避免西方文化中“dragon”所带有的负面含义对中国文化内涵的曲解,提升译文在目标文化中的接受度,增强文化传播效果。这种译者的干预和注释行为体现了译者在翻译中的创造性和责任感,能够弥补机器翻译在理解文化内涵和言外之意方面的不足,保证翻译在跨文化交际中发挥积极作用。

(三) 人机协作的模式语法

1. 互补性分工机制

在翻译过程中,发挥机器与人的各自优势,构建互补性分工机制是提高翻译效率和质量的有效途径(徐鑫涛 et al., 2024)^[19]。在处理大文本时,机器凭借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和快速的运算速度,可以高效地完成命题内容的制作。ChatGPT 在处理文本时,信息密度可达 98 字/分钟(王华树, 2023),可以快速生成大量的译文^[20]。但机器在处理语言的维度上有局限性,对语言理解和表达的影响难以充分考虑上下文、文化背景等因素(沈宏梁 et al., 2025)。而人文译者则具有丰富的语言文化知识、敏锐的语境感知能力和灵活的语用推理能力(胡作友 & 彭九州, 2023)。通过人工干预,可以对机器翻译结果进行语用维度的调控,并根据目标语境的特点和需要,对译文的表达进行优化,提高译文的语用适用性。研究表明,人工干预可使 PAI 提升 28%(李晗佶 & 陈海庆, 2020),显著增强译文在目标语境中的交际效果。因此,在翻译实践中,应合理分配人机任务,让机器负责快速处理文本的基本内容,人类专注于对语言维度的精细调控(刘成科 & 孔燕, 2023),实现人机互补,共同提高翻译质量,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机协同(吴美萱 & 陈宏俊, 2023)^[21]。

2. 转译网络的重构

建立术语-语境-伦理的三元知识图谱,是重构翻译网络,提高翻译质量的关键一招。知识图谱将语义信息、术语使用语境、相关伦理要求等综合起来,为翻译提供了全面系统的知识支撑,为翻译活动提供了更加准确全面的信息指引,是一本以翻译为中心的知识图谱^[22]。在这一知识图谱中,术语不再孤立存在,而是与特定的语境信息相联系,并融入了伦理的考虑因素。例如,知识图谱在翻译涉及文化敏感内容的术语时,既能提供多种语言表达术语的方式,又能从伦理角度对不同翻译选择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评估,如文化背景、社交场合、不同翻译选择等,结合具体语境,给出最恰当的翻译建议,避免因文化理解上的误区或表达不当而引起伦理纠纷^[23]。

这种三元知识图谱已应用在 WTO 文件的翻译中,对于复杂贸易术语、条款的翻译,通过知识图谱快速检索到特定语境下某个术语的意思,并结合伦理要求,将准确的意思翻译给原文内容、同时翻译出在

国际交流中符合相应伦理要求的内容,如知识产权保护的条款中,知识图谱可以提供对应语境下某个术语的解释,在翻译过程中应该遵循的国际伦理准则。避免在翻译过程中因为文化差异所带来的翻译偏差,提高翻译质量、跨文化交流的效果,为国际贸易领域提供信息准确传递、有效沟通的基础^[24]。

四、伦理重构的实践进路

(一) 技术设计: 语用参数的算法植入

在翻译技术提升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针对性的有效措施。为增强翻译技术对文化语境的敏感度,开发文化标记识别模块成为关键之举。在“一带一路”相关文献翻译中,存在诸多文化内涵丰富的词汇与表达,普通翻译技术若无法妥善处理,易造成文化缺失或误解。而文化标记识别模块借助自然语言处理和深度学习技术,能自动识别并分类文本中的文化专有项,例如精准识别中文文献里“丝绸之路”“太极”等词汇的文化属性,同时从知识库调取对应文化解释与标准译文^[25]。实践证明,应用该模块后,“一带一路”文献翻译准确率提升至93%,极大促进了跨文化交流与合作。此外,将言语行为分类器嵌入翻译算法,对提升翻译对言语行为的理解与处理能力意义重大,尤其适用于合同、法律等对言语行为准确性要求极高的文本翻译。以合同翻译为例,合同条款中的“shall”“may”等词体现特定施为意图,其准确翻译关乎合同双方权利义务界定。言语行为分类器可自动识别、分类原文言语行为,助力翻译算法把握条款语用功能,选择恰当译文表述,使合同翻译错误率降至7%,有力保障了合同翻译质量与法律效力。在多模态数据库建设方面,建立包含副语言特征的语料库是重要一环。副语言特征如语音语调、面部表情、肢体动作等,在语言交流中传递丰富信息,有助于理解话语真实意图和情感态度。但传统翻译语料库多以文本数据为主,难以涵盖这些信息,致使翻译技术处理复杂语义时存在局限。构建含副语言特征的语料库,收集标注大量音频、视频语言数据,将文本与副语言信息结合,能让翻译技术在翻译口语对话时,依据文本并参考副语言特征,更精准把握说话者情感倾向与言外之意。按要求,此类语料库中视频语料占比需超30%,以此丰富翻译技术信息来源,提升复杂语境下的翻译能力,使译文更贴合实际交流情境,增强准确性和自然度。

(二) 制度规范: 语言学导向的标准制定

在翻译领域,为提升翻译质量与译者能力,采取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措施。在翻译质量评估方面,BLEU值作为常用的机器翻译质量评估指标,在神经机器翻译中平均可达68.2,通过对比机器翻译结果与多个参考译文的词汇重叠程度,在词汇层面体现了翻译的准确性。但其局限于词汇表面匹配,难以兼顾语义、语用及文化层面的适切性。而PAI指数从语用适切性出发,综合考量译文在目标语境的可接受性、与语境契合度及文化传递效果,某实验组中其平均得分提升至4.1/5,彰显出评估语用质量的有效性。将二者结合形成双轨评估体系,在评估商务合同翻译时,BLEU值可检查专业术语准确性,PAI指数衡量合同条款在目标商务语境的语用合理性,全面且准确地为翻译质量评估提供依据。在译者能力提升方面,译者能力认证改革至关重要。增加语用推理测试,用于考察译者在实际翻译中依据语境信息准确推断原文隐含意义、言外之力,并恰当表达的能力,例如翻译文学作品中含隐喻、双关语句时的应用。试点显示该测试通过率仅61%,凸显当前译者在语用推理能力上有较大提升空间,纳入此测试能引导译者强化语用知识学习与运用,提高翻译中的语用分析能力。此外,强制伦理情景模拟也是关键举措,翻译实践常遇文化偏见、信息误导等伦理困境,要求译者每年参加至少20学时的伦理情景模拟培训,模拟如翻译政治敏感内容时平衡信息传递与文化尊重等真实场景,让译者在其中分析、决策,增强伦理敏感度与解决实际伦理问题的能力,促使译者在日常工作中保持伦理自觉,产出符合规范的高质量译文,维护翻译行业秩序与声誉^[26]。

（三）学科建设：语言资源伦理学的诞生

语言资源伦理学的理论建构依托于语用学、语言哲学与技术伦理的深度融合。语用学聚焦于语言实际使用中的意义生成及理解机制，为剖析翻译中的语境依赖、言语行为等提供微观理论支撑；语言哲学从宏观层面探究语言本质、意义与世界的关联，为语言资源伦理学筑牢哲学根基，助力明晰翻译过程中语言符号与文化、价值的深层联系；技术伦理针对翻译技术发展，审视其引发的诸如算法偏见、数据隐私等伦理问题与挑战。通过整合这三门学科构建元伦理框架，在翻译技术伦理研究中，从语用学视角剖析翻译中意义协商的伦理维度，如跨文化翻译时如何借助语用策略规避文化误解，维护文化平等交流；借助语言哲学思索翻译技术对语言本质及意义传播的影响，探讨技术发展背景下翻译伦理责任的边界；依据技术伦理规范翻译技术的研发与应用，保障数据使用公正、算法设计合理。这种多学科融合的理论建构为语言资源伦理学奠定坚实基础，使其能全面、系统地研究翻译技术中的伦理问题，为翻译实践提供科学有效的伦理指引。与此同时，方法论上也实现创新，开发的伦理敏感型对齐工具利用自然语言处理和机器学习技术，能深度分析翻译语料和译文，检测文化偏见、性别歧视等伦理问题，处理大规模翻译数据时，对特定文化词汇翻译的刻板印象、性别化职业称谓翻译的偏见等现象识别准确率可达 89%，为纠正和优化提供依据，助力规避潜在伦理风险，促进跨文化交流健康发展。建立的动态语料监控系统实时监测语料库使用及数据变化，及时察觉影响翻译伦理的因素，像方言翻译中的标准化消解问题，系统可依据语料使用频率、翻译效果反馈等数据及时预警，维护语料多样性和文化完整性，保障翻译技术遵循伦理规范，为翻译实践提供可靠语料支持与技术保障。

五、结论：走向负责任的语言技术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深入探究语用逻辑视域下翻译技术伦理的重层建构问题，经实证分析与理论推演得出关键结论。在语言形式与伦理可能的关系上，实验明确显示语境参数与伦理风险呈显著负相关，即语境参数每提升 1 单位，伦理风险下降 0.7 ($p < 0.01$)，这表明精准把握与运用语境因素，对降低翻译过程中的伦理风险、保障翻译结果的准确恰当意义重大。毕竟语境作为语言形式重要部分，决定着翻译的伦理质量，如在翻译有文化内涵的词汇时，充分考量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的文化语境，可规避因文化差异造成的误解与不当翻译，进而降低伦理风险。在语用逻辑对翻译技术伦理治理的作用方面，构建的三维模型成效显著，以法律翻译领域为例，应用该模型后法律翻译纠纷减少 42%。此三维模型从命题真值、言外行为和交际效果三个维度全面评估与优化翻译，为翻译技术伦理治理提供实用工具：命题真值层面保障翻译内容准确，避免语义错误引发法律纠纷；言外行为层面精准传达原文施为意图，维护法律文件权威性与约束力；交际效果层面使译文契合目标语境语用习惯，增强法律文件的可理解性与可接受性。该模型的成功应用，证实了语用逻辑在翻译技术伦理治理中的有效性与实用性，为翻译行业规范化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二）未来展望

翻译技术伦理研究取得进展，但仍有问题待解决，指明了未来研究方向，小语种语数据库建设覆盖率低，仅 15%，小语种翻译对文化多样性和交流至关重要。未来需要加大投入，多渠道收集语料，运用先进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进行标注整理，丰富数据库内容和功能，建立综合性数据库，提供全面准确的语用支持，提升翻译质量和效率，促进小语种文化的全球传播。动态推理算法现有技术局限性，语境处理延迟 3.2 秒，影响翻译的实时性和流畅性，未来需要研究创新动态推理算法，结合深度学习、强化学习等技术，实现快速准确处理语境信息，实时理解翻译。开发算法，动态调整翻译策略，促进翻译技术的智能化和高效化，以提高灵活性和适应性，降低延迟，增强实时场景应用性能。

基金项目

无。

利益冲突

作者声明，在发表本文方面不存在任何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

- [1] 熊欣, 王奕璇. “八备”论下机器翻译中的伦理思考 [J]. 宜春学院学报, 2025, 47(01): 91-97+148.
- [2] 孙佳. “人工智能 + 教育”背景下机器翻译的伦理失范问题研究 [J]. 海外英语, 2024(14): 34-37.
- [3] 杨凌宇, 杨阳. 从翻译伦理角度重识数字技术时代译者职责 [J]. 新视野, 2023(02): 145-147.
- [4] 王华树, 刘世界. 大数据时代翻译数据伦理研究: 概念、问题与建议 [J]. 上海翻译, 2022(02): 12-17+64.
- [5] 胡开宝, 李晓倩. 大语言模型背景下翻译研究的发展: 问题与前景 [J]. 中国翻译, 2023, 44(06): 64-73.
- [6] 杨璐. 多语种档案的语言翻译与管理研究 [J]. 档案工作实践, 2025(03): 171-173.
- [7] 刘成科, 孔燕. 翻译技术伦理的本质追问及基本向度 [J]. 外语学刊, 2023(05): 79-85.
- [8] 徐鑫涛, 翟风杰, 杨立学. 翻译伦理视域下机器翻译伦理体系建构的应然与举措探究 [J]. 对外经贸, 2024(11): 103-105+140.
- [9] 吴术驰. 翻译伦理研究的反思与重构刍议 [J]. 中国翻译, 2021, 42(05): 5-14+191.
- [10] 殷明月. 翻译与伦理的交互纵深性研究回顾与展望——《劳特里奇翻译与伦理手册》介评 [J]. 外国语, 2023, 46(01): 117-121.
- [11] 张霄军, 邵璐. 构建可信赖机器翻译系统的基本原则——一种基于工程伦理的观点 [J]. 外国语文, 2021, 37(01): 1-8.
- [12] 黄友义. 构建满足时代需求的翻译队伍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25, 57(02): 281-289.
- [13] 李征. 回归伦理学——翻译伦理研究的未来之路 [J].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 2023(01): 24-32.
- [14] 王寒冰. 机器翻译伦理挑战与应对策略研究 [J]. 齐齐哈尔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2024(05): 57-60.
- [15] 沈宏梁, 王新, 罗晖. 机器有机器的理解: 机器翻译中理解问题的哲学思考 [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25, 47(03): 35-41.
- [16] 张磊, 朱慧芳, 黄德根. 基于深度学习的手语翻译: 过去、现状与未来 [J]. 软件学报, 2024, 35(08): 2938-2963.
- [17] 李晗佶, 陈海庆. 技术化时代的翻译伦理研究: 挑战与拓展 [J]. 东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0, 22(01): 112-119.
- [18] 朱健平. 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的翻译研究: 现状与展望 [J]. 外语学刊, 2023(05): 86-92.
- [19] 肖志清, 王少爽. 人工智能时代翻译技术应用伦理研究: 概念、问题与对策 [J]. 外语电化教学, 2023(05): 106-112.
- [20] 吴美萱, 陈宏俊. 人工智能时代机器翻译的伦理问题 [J]. 外语学刊, 2023(06): 13-18.
- [21] 王华树, 崔启亮, 刘世界. 生成式 AI 翻译技术在法律翻译中的伦理风险研究 [J]. 中国翻译, 2024, 45(03): 110-117.
- [22] 高玉霞, 崔启亮. 生成式 AI 时代翻译制度建设的挑战与对策 [J]. 上海翻译, 2024(03): 36-42.
- [23] 张媛飞, 张法连. 生态翻译伦理视角下海洋强国战略外宣翻译研究——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 (英文版) 为例 [J].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4(03):121-128.
- [24] 胡作友, 唐青叶. 西方翻译伦理思想批判性审视 [J]. 中国翻译, 2022, 43(06):22-29.
- [25] 张瑞航, 赵世举. 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下翻译技术伦理负载的探索 [J]. 外国语, 2023, 46(06):104-112.
- [26] 李征. 元翻译伦理——翻译伦理研究的基石 [J]. 上海翻译, 2022(03):14-20+64.

黄河战略背景下黄河生态搬迁安置点人居环境 满意度评价与提升路径研究 ——以梁山县为例

刘嘉祎 张林瀚 刘蕾 董卓涵 周晶晶
(山东工商学院, 山东烟台, 264005)

版权说明: 本文是根据知识共享署名 - 非商业性使用 4.0 国际许可协议进行发布的开放获取文章。允许以任何方式分享与复制, 只需要注明原作者和文章来源, 并禁止将其用于商业目的。

摘要: 据《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指出, 黄河流域面临洪水威胁、高质量发展不充分及民生发展不足等重大问题。梁山县积极响应国家号召, 规划实施黄河流域居民搬迁工程。本研究运用文献分析、实地调查、问卷分析及 SPSS 分析等方法, 聚焦评估梁山县黄河生态搬迁居民人居环境的满意度, 分析影响满意度之因素, 并探索提升居民幸福感和获得感之路径, 以期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提高当地居民生活质量。

关键词: 黄河流域; 生态搬迁; 人居环境满意度; 提升路径

DOI: <https://doi.org/10.62177/apss.v1i1.303>

黄河流域面临洪涝威胁、高质量发展滞后及民生短板问题, 因黄河泥沙含量极高, 治理难度极大, 水害严重。梁山县作为沿黄县份, 实施生态搬迁工程, 但居民满意度直接影响工程成效。本研究聚焦搬迁安置点, 分析人居满意度影响因素, 提出优化策略, 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实践参考。

一、研究对象及方法

本研究选取梁山县小路口镇和赵垆堆乡为地域范围, 研究内容主要聚焦于居民搬迁的整体满意度, 以及在安置、生产生活、社会融合等方面的具体满意情况。因此本文基于梁山县黄河新苑社区和翠屏家园

作者简介: 刘嘉祎 (2004—), 女, 汉族, 山东省济宁市人, 山东工商学院公共管理学院本科生, 研究方向: 城市管理学; 张林瀚 (2004—) 男, 汉族, 山东省菏泽市人, 山东工商学院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本科生, 研究方向: 自动化学; 刘蕾 (2003—), 女, 汉族, 湖南省永州市人, 山东工商学院国际商学院本科生, 研究方向: 会计学; 董卓涵 (2004—), 汉族, 山东省泰安市人, 山东工商学院会计学院本科生, 研究方向: 会计学; 周晶晶 (2003—), 汉族, 安徽省淮北市人, 山东工商学院统计学院本科生, 研究方向: 应用统计学

社区开展居民搬迁满意度设计调查问卷，运用统计分析软件对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包括影响因素分析、SPSS 分析以及 GIS 分析等，剖析人居环境建设成效的居民满意度，有助于尽快稳定并全面优化易地搬迁安置点的社会、经济、文化与生态整体发展格局^[1-2]。

二、研究内容

（一）搬迁工程概况

黄河新苑社区，位于梁山县小路口镇，2017 年 12 月启动建设，并建 300 余平黄河记忆展览馆于服务中心三楼，传承黄河文化。翠屏家园社区在梁山县赵堁堆乡，是当地基建与城乡一体化关键项目，2018 年 9 月开工，有迁建楼 112 栋，安置群众 7373 名，教育资源优势显著，城乡融合发展。黄河生态搬迁始终坚持遵循生态、经济规律，把资源利用保护、生产建设与生态建设结合起来，把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统一起来^[3]。

（二）样本结构

在本次问卷调查中，共发放问卷 460 份，回收 363 份。经过有效性筛选，最终确认 312 份有效问卷用于数据统计、分析与研究。其中男性 163 人，女性 149 人，男女比例大致趋于 1.1 : 1。本次调研受访者年龄分布如下：0-18 岁青少年 98 人（31%），19-55 岁中青年 65 人（21%），55 岁以上老年人 149 人（48%）。因采用线下问卷，受访者年龄主要集中在 55 岁及以上。

（三）研究区居民满意度指标体系构建

本问卷以自然生态环境、物质设施环境、社会人文环境和经济发展环境为一级指标的搬迁居民人居环境满意度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分为 3 个层次，包括 4 个一级指标、10 个二级指标和 24 个三级指标。问卷基于 22 项指标设计，采用 5 级满意度量表（1-5 分），量化居民的主观意愿，指标体系见表 2-1。

表 2-1 研究区居民满意度指标及各项指标平均得分

目标层 A	支持层 B	平均得分	分类层 C	平均得分	指标层 D	平均得分
搬迁居民 人居环境 满意度	自然生态环 境（B1）	4.01	卫生环境状况（C1）	3.85	D1 生活饮水安全	3.70
					D2 垃圾收集水平	4.00
			农业生态环境（C2）	4.05	D3 生产污水处理	4.00
					D4 农业机械化水平	4.10
			自然环境状况（C3）	4.17	D5 河湖污染处理	4.01
					D6 植被覆盖程度	4.21
					D7 自然灾害国防	4.30
	物质设施环 境（B2）	4.34	公共服务设施条件（C4）	4.44	D8 教育设施水平	4.45
					D9 医疗设施水平	4.46
					D10 文体设施水平	4.40
			个体居住条件（C5）	4.37	D11 房屋区位条件	4.40
					D12 房屋舒适度	4.33
			基础设施供给（C6）	4.20	D13 交通便捷程度	4.19
					D14 商业设施水平	4.15
					D15 网络通讯水平	4.27
					D16 文化活动类型	4.10
	社会人文环 境（B3）	4.16	文化发展环境（C7）	4.30	D17 邻里关系状况	4.42
					D18 社会道德水平	4.39
					D19 民主参与程度	3.81
			社会保障环境（C8）	4.02	D20 社会保障水平	4.23
					D21 就业区位条件	3.76
	经济发展环 境（B4）	3.89	就业环境条件（C9）	3.79	D22 农户就业水平	3.81
					D23 家庭收入水平	3.97
			收入消费水平（C10）	3.98	D24 物价消费水平	3.98

（四）研究区居民的满意度分析

1. 对四个一级指标得分情况分析

由表 2-1 可知，居民对不同环境的满意度平均得分如下：自然生态环境 4.01 分，物质设施环境 4.32 分，社会人文环境 4.16 分，经济发展环境 3.89 分。其中，对物质设施环境满意度最高，对经济发展环境满意度最低，具体结果见表 2-1。

2. 对自然生态环境满意度统计结果分析

在耕地土地流转方面，采用“支部+合作社”模式，群众以耕地入股，土地所有权归集体所有，每亩耕地增加收入约 1300 元。在房屋分配方面，回迁居民安置面积价格按拆迁补偿协议确定，超面积部分按市场价格购买。搬迁项目初期统计居民对安置楼层的选择意愿，楼层设置包括多层（4+1 和 5+1 形式）和高层（11 层）。在自然生态环境方面，三级指标中植被覆盖程度得分最高（4.21），生活饮用水安全得分最低（3.70），15.5% 居民评价为一般，社区自来水普及率 100%，居民用水更方便，社区物业由自身管理，植被覆盖度高。

3. 对物质设施环境满意度统计结果分析

在物质设施环境方面，三级指标中医疗设施水平得分最高（4.46），商业设施水平得分最低（4.15）。92% 的居民对物质设施环境表示满意或非常满意。新社区有效解决了居民生活的四难问题，社区提供 1000 平方米的卫生室用房，定期开展义诊活动，提供免费医疗咨询和健康指导。

4. 对社会人文环境满意度统计结果分析

在社会人文环境方面，三级指标中邻里关系状况得分最高（4.42），民主参与程度得分最低（3.81）。绝大多数居民对社会人文环境表示满意，说明社区人文环境建设取得居民认同。黄河新苑社区积极开展文化活动，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邻里纠纷按楼长—网格员—社区—政府顺序解决，社区设有“老马”工作室，由书记亲自调解。翠屏家园社区则按物业—社区—村大队干部—政府顺序逐级解决邻里纠纷，有效化解矛盾。

5. 对经济发展环境满意度统计结果分析

在经济发展环境方面，三级指标中就业区位条件得分为 3.76，农户就业水平得分为 3.81，家庭收入水平得分为 3.97，物价消费水平得分为 3.98。30% 的居民一般满意，1.84% 不满意，0.16% 非常不满意。经济环境对居民影响较大，需社区政府关注解决。为解决就业问题，社区积极建立社企合作，提供就业岗位并成立“两新”联盟小组，开发公益性岗位。

（五）熵值法分析

1. 步骤

步骤 1：数据标准化处理

正向指标：

$$X'_{ij} = \frac{X_{ij} - \min(X_{ij})}{\max(X_{ij}) - \min(X_{ij})}$$

负向指标：

$$X'_{ij} = \frac{\max(X_{ij}) - X_{ij}}{\max(X_{ij}) - \min(X_{ij})}$$

步骤 2：计算每个指标的比重

$$p_{ij} = \frac{X'_{ij}}{\sum_{i=1}^n X'_{ij}}$$

步骤 3：计算信息熵

$$e_j = -k \sum_{i=1}^n p_{ij} \ln(p_{ij})$$

步骤 4：计算信息效用值

$$d_j = 1 - e_j$$

步骤 5：计算权重

$$w_j = \frac{d_j}{\sum_{j=1}^m d_j}$$

步骤 6：计算综合得分

$$S_i = \sum_{j=1}^m w_j \times X_{ij}$$

2. 结果分析

熵值法分析了各一级和二级指标的信息熵值（e）、信息效用值（d）及权重系数（w），确定了各指标在整体满意度中的相对重要性。结果显示，就业区位条件权重最高（8.22%），其次是农户就业水平（8.06%），表明就业机会和工作地点便利性对居民满意度的影响最大。物价消费水平（7.09%）权重较高，显示生活成本是关键因素。生活饮水安全（6.87%）和家庭收入水平（5.72%）权重也较高，说明基础设施和收入对满意度的贡献显著。具体结果见表 2-2。

表 2-2 熵值法计算权重结果汇总

项	权重系数 w	项	权重系数 w
D1 生活饮水安全	6.87%	D13 交通便捷程度	3.91%
D2 垃圾收集水平	4.57%	D14 商业设施水平	3.98%
D3 生产污水处理	3.43%	D15 网络通讯水平	2.78%
D4 农业机械化水平	2.70%	D16 文化活动类型	4.36%
D5 河湖污染处理	4.03%	D17 邻里关系状况	3.24%
D6 植被覆盖程度	2.10%	D18 社会道德水平	4.24%
D7 自然灾害国防	2.93%	D19 民主参与程度	5.50%
D8 教育设施水平	2.68%	D20 社会保障水平	2.62%
D9 医疗设施水平	2.65%	D21 就业区位条件	8.22%
D10 文体设施水平	2.53%	D22 农户就业水平	8.06%
D11 房屋区位条件	2.68%	D23 家庭收入水平	5.72%
D12 房屋舒适度	3.11%	D24 物价消费水平	7.09%

3. 满意度加权得分

为利用熵值法对满意度进行综合评估，我们设置 5 个等级，如下：

表 2-3 满意度评价分级

综合指数分值	1 以下	1-2	2-3	3-4	4-5
满意度评价	较差	需改进	一般	良好	优秀

根据熵值法加权得分结果，312 个样本的满意度综合平均得分为 4.045，属于“优秀”评级（4-5 分），总体来看，安置点在生态保护和社区发展方面效果良好，提升了居民幸福感和获得感，为类似项目提供了实践依据，也指出了持续改进的关键领域。

三、当前黄河生态搬迁研究区存在问题

冯莉 (2023) 的研究得出我国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主体统筹、职能部门协调、规制工具选用偏好等方面均呈现出协同效果不足的困境^[4]。孙付华,潘登,尚泽龙 (2023) 结果表明：生活安置、生产安置、权益保障各环节满意度对移民整体安置满意度具有直接影响^[5]。

依据对黄河新苑社区和翠萍家园社区的调查分析，本文分析得出以下问题：

（一）基础设施与居住环境方面：

黄河新苑社区地势低洼易积水，高层因水压问题存在偶尔缺水严重；两社区自来水水质欠佳、污水处理滞后。同时，医疗设施不足，仅有社区医务室，缺乏大型医院与专业医疗机构，难以满足居民日常需求，急诊与特殊治疗需求。

（二）社区关系与发展方面：

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方面存在着如下现状：一是基层政府过度干预，社区自治能力弱化；二是社区与居民之间缺乏有效沟通；三是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能力弱^[6]。翠屏家园社区选房随机导致邻里接触少、矛盾易发且调解效率低；民众对社区民主参与程度满意度虽高但仍存在问题，信息不畅与活跃度低。学者董飞龙,吴红晨（2024）研究东明黄河滩区搬迁后居民对各项民生福祉的满意度，研究结果也表明就业方面居民的不满意度略高^[7]。黄河新苑社区和翠屏家园社区老龄化严重，可持续发展能力弱。

（三）公共服务与资源方面：

教育资源短缺且质量不均，学校数量有限、教学设施陈旧、师资力量薄弱，课外辅导与兴趣班资源稀缺；就业创业支持乏力，总体就业机会稀缺，对高学历及技能型人才吸引力不足，创业者扶持力度小。

四、对策和建议

（一）优化基础设施与居住环境

全面升级供水系统，实施雨污分流工程。借鉴上海成功经验，结合社区地势低洼特点，新建雨水主管，改建排水设施，提升防汛排水能力。针对高层缺水问题，增设加压设备，优化供水管网布局，确保高层住户用水稳定。

水厂对供水管道进行升级改造，采用新型管材和净化设备，提高水质净化标准。建立长效水质监测机制，引入智能管理系统，实时监控水质情况。加强社区医疗机构建设，更新医疗设备，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建立高效转诊机制，与周边大型医院合作，确保急诊与特殊治疗患者得到及时救治。优化药品供应链，与医药公司合作，保障药品充足供应。

（二）促进社区和谐发展与居民参与

社区应合理规划公共空间，建设休闲文化广场，配备完善的文体活动设施。定期举办文化节、亲子活动等社区改善项目，增进居民互动。针对邻里关系问题，组织多样化的社交活动，如邻里节、兴趣小组等，增加邻里交流机会。设立定期座谈会、交流会，形成双向沟通机制。关注老年人、儿童等特殊群

体需求，提供个性化服务。设置线上线下意见箱，引导居民积极参与社区事务决策和管理。

加快产业培养，推动家具产业园区智能化升级，引进先进生产线，提升产品质量和附加值。政府投资规模化养殖特色农产品，鼓励居民参与，提供技术指导和市场销售渠道。强化品牌建设，通过互联网平台推广本地特色产品，吸引更多青年回乡就业创业，缓解社区老龄化问题，促进社区可持续发展。

（三）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与资源保障

加大教育投入，扩建学校与幼儿园，更新教学设施，吸引优质师资。与先进学校开展深度合作，定期进行师生交流活动，提升教育质量。丰富课外活动，设立各类兴趣班与辅导班，涵盖艺术、体育、科技等领域，推动学生全面发展。建立教育资源共享平台，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在线共享。

设立专项创业扶持基金，为创业者提供资金支持。开展创业培训课程，邀请专家进行指导，提升创业者能力。制定优惠政策，如税收减免、场地租赁优惠等，吸引更多高学历及技能型人才入驻社区。搭建就业创业服务平台，发布招聘信息、提供职业指导等服务。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黄河战略背景下黄河生态搬迁安置点人居环境村民满意度评价与提升路径研究——以梁山县为例》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2411688009。

利益冲突

作者声明，在发表本文方面不存在任何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

- [1] 王海明. 黄河滩区农村迁建社区建设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研究 [D]. 北京林业大学, 2022.
- [2] 武丹, 耿虹, 王小莉. 易地搬迁安置点人居环境建设适配性评价及优化策略——以临沧市临翔区为例 [J]. 长沙理工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24, 21(02): 133–146.
- [3] 任耀武, 袁国宝, 季凤瑚. 试论三峡库区生态移民 [J]. 农业现代化研究, 1993 (01): 27–29.
- [4] 冯莉. 《黄河保护法》实施背景下流域生态环境规制思路与完善对策——基于法律政策文本量化分析 [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23, 37(07): 190–196.
- [5] 孙付华, 潘登, 尚泽龙, 等. 江苏省水利工程移民安置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 [J]. 水利经济, 2023, 41(05): 78–83+100.
- [6] 司利霄. 黄河滩区迁建社区治理中居民参与问题研究 [D]. 山东大学, 2023.
- [7] 董飞龙, 吴红晨, 喻千, 等. 乡村振兴背景下黄河滩区搬迁后居民满意度调研——以黄河入鲁第一县东明县为例 [J]. 智慧农业导刊, 2024, 4(13): 54–57.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研究

张闰雨

(云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云南昆明, 650500)

版权说明: 本文是根据知识共享署名 - 非商业性使用 4.0 国际许可协议进行发布的开放获取文章。允许以任何方式分享与复制, 只需要注明原作者和文章来源, 并禁止将其用于商业目的。

摘要: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 必须做到“两个结合”, 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有着密切的契合性, 前者对后者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而后者又是前者的源头活水。根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存在着的紧密内在联系, 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结合起来, 有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为中国梦的实现注入强大的精神力量。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第二个结合”

DOI: <https://doi.org/10.62177/apss.v1i1.309>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 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9]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是中华文化的精髓, 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 也是我们国家特有的文化优势。我们要提高我们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 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把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中华的优秀文化精华结合起来, 把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融为一体, 使之具有中国特色, 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得到持续的历史和群众基础, 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黏度而乏味凤尾鱼广泛而富有二分全额付好全额付发起虐发过去发挥为法国陌七公分发挥企鹅官方各位贵宾窝囊废还是短发给我个饭哈佛二位官方发发 焕发全额付吧 分布七公分阿斯弗而且官方 i 父亲二分 00000000000000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条件

(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突出特点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文化可能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 从纵向来看, 中华文化历经朝代更迭、时代变迁, 却未曾被阻断, 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 从横向上来看, 中华文化包含了汉民族及众多少数民族的

作者简介: 张闰雨 (2001 年 5 月), 女, 汉族, 云南大理, 硕士研究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邮箱: 1519632170@qq.com

文化精髓。虽然经受了多次外族文化的入侵，但仍以其强大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内聚力、传承力在多次文化冲击、思想交锋中以积极的姿态吸收其他文化的先进之处，将其积极因素内聚于中华文化的体系内。同时又保留自身文化核心，不断丰富具体的文化内容实现创新性发展。这种不断丰富和完善的内聚式文化发展道路进一步增强了中华民族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力，从而使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的传承能力，中华文化也因此获得源源不断的生命力。^[10]这种内聚式的文化发展道路首先表现为中华文化体系内不同流派文化的相互尊重和借鉴。在春秋战国时代，形成了以儒、道、法为代表的各种流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蔚为大观。虽然各家学说都有各自的特点，但并非完全没有共通点。比如，孟子对孔子的“仁”和“礼”进行了继承和吸收；

荀子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则是对道家认识论和阴阳学说的借鉴……西汉董仲舒在孔孟儒家学说的基础上，将道家、法家、阴阳家等各流派结合在一起，创建了一套基于阴阳五行与宇宙观的新儒家学说。纵观历史发展过程，各民族间的交流融合也是屡见不鲜。中华民族对待外来文化时也绝不是简单地照搬照抄，而是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也正因如此，中华文化在近代资本主义殖民扩张的冲击下并没有土崩瓦解，而是经过反复的实践检验，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中开创了适合自己特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可以说，没有这种内聚式文化发展道路的历史传承，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可能；正是中华文化这一突出特点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可能。”^[11]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文化动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开放包容、内聚力强、传承力强的特点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可能性，然而选择马克思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还需要更坚定的动力因素做支撑，那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价值取向。只有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价值取向与马克思主义强调的价值取向相一致时马克思主义才能顺利在中华大地传播开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才能顺利进行下去，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被人民群众所接受；而如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追求截然相反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将失去关键的文化动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也就不可能实现。打不碎发 v 阿飞办法就是房价是否 JISD 安抚关于 8 埃是法国一旦发生吧啊阿三发放办法放一放吧阿斯弗按规范爱国法官违法八分拨打 u 十分感动

中华传统文化自古以来就有着强烈的实用色彩，鸦片战争结束后，中国逐渐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陷入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被动局面，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成为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从而使中华民族实现独立，自由，民主和富强，成为先进的志士仁人和知识分子们的共同心愿。面对当时众多的主义与学说，中华民族的有识之士迅速将目光聚焦在旨在改造世界的马克思主义上，这与“救民族于危亡”“为中华民族崛起而奋斗”的价值追求密不可分。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一批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正是在这样的价值追求驱动下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积极倡导白话文运动、理论文本转换、开启思想论战，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文化土壤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涉及中华民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岁月洗礼积淀下来的文化精髓，为人们提供了最广泛的文化认同，是广大中华儿女所共有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的灵魂与血脉，是中国人民的精神家园。历史实践已经证明，任何一种新的思想文化传播到一个民族或地区中来，只有与其文化传统和社会生活紧密结合才能够被这个民族或地区的人民所真正接受认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发芽，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备内在相通性，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思想土壤。“中国文化中本有悠久的唯物论、无神论、辩证法的传统，有民主主义、人道主义思想的传统，有许多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因素、有大同的社会理想，如此等等，因而马克思主义很容易在中国的土壤里生根。”^[12] 阿布只有让文化在马注意生根才能还哈哈长大为我们运用十三点八万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以人为本”的思想，这一思想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并延续了二千多年绵延不绝。先秦时孟子提出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3]，老子的“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14]，墨子所提倡的“尚贤”观，无论亲疏，无论贫富，无论相貌如何，都能治理天下，无不显示出强烈的民本观念。这些论述与马克思主义强调的人民性亦是相通的，马克思恩格斯同样强调人民才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力量，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更是形成了成熟的群众史观。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正是在吸收“以人为本”思想的同时，又把马克思主义的民主思想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自己的基本立足点，坚持走群众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领导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跨越。中华民族自古以来都追求“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虽然这些理想是建立在小农生产基础上的乌托邦式的美好追求，与共产主义理想有着本质区别，但也有相通之处。另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还蕴含着朴素唯物史观、辩证法的思想，尽管有空想、主观的成分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华民族接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认知障碍，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文化土壤。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焕发蓬勃生机

马克思主义从来不主张割断传统，而且他本身也是在批判的继承人类优秀思想文化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从这一点上讲，判断一个国家、一个政党是否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与政党，其中的标准之一就是看其如何对待历史、如何对待传统文化。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始终坚持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在长期的革命实践、建设实践和改革实践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地位与作用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对于如何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有了更为丰富的经验。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坚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独具一格的中国特色和风格。在新的历史时期，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是一条根本之路。蕴含着丰富内容、多元形态的传统文化在同科学社会主义高度融合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始终注重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而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焕发出新的活力。

中国共产党人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始终注重继承和发展优秀民族文化。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真正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密切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众所周知，毛泽东同志始终重视对中国历史、传统文化的学习，他的思想文化中有大量内容都来自于中国经典文化书籍。例如，在他的军事思想中，汲取了《孙子兵法》、《左传》、《水浒传》等古籍中的有益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游击战等杰出的战略思想方针，形成独具特色的军事战争理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立的最早的理论成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优秀成果，更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结晶。的报复全额付缺乏 v 去爱很大把去污粉全微分安好苏菲全额付爱好是法国前锋爱好是发过去给发 8 我缺乏感情

我们党一直在社会主义实践中不断摸索不断总结，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进一步结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开拓了

更加广阔的前景。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基本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坚持批判继承和创新发展并举，继承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传统。例如，邓小平同志提出要实现“小康社会”的建设目标，这里的“小康”一词，最早出现在中国古代典籍《礼记》，指的是比理想中的大同社会较低一级的社会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下，人民处在解决温饱之上还未达到富裕的较为宽松的阶段。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将这一概念古为今用，以小康社会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阶段性目标，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朝着这一目标团结奋斗。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像这样创造性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文化的例子还有很多，既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树立了榜样，又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焕发生机与活力。以小康社会目标鼓励大家积极以朝着目标，图啊奋斗才能促进国家超着远大理想奋进，我们党经过长期的探索和总结，已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要求，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科学理论，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容丰富，涵盖广泛，积极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突出强调了文化自信，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效。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明确提出“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15]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传统美德，必须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思想精髓，使中华民族以更加自信和自强的精神面貌挺立在世界民族之林。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在新时代的条件下取得了新成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化过程中，同样展现出旺盛的生机和活力。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创新发展路径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类解放的学说，一种科学的无产阶级世界观，是直接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它对资本主义世界和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进行了科学地揭示，指出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为无产阶级改造旧世界、建立新世界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诞生于德国，作为一种来自于欧洲的思想要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由欧洲形式转化成中国形式，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必然会遭到资本主义及学者的种种攻击和非难，正如列宁在总结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时指出：“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16]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中，要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

（二）采取正确态度对待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其主体内容形成于封建社会时期，对于维护封建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发挥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联系起来，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必须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对中华文化进行科学的分析与评价，既要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与我国现代化建设相矛盾冲突之处，警惕传统文化中消极、腐朽内容对社会主义建设相可能会带来的不利影响；同时也要对文化精华加以继承和弘扬，促进民族文化的持续发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要以是否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否有利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标准，进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从而实现传统文化的健康发展。另外，要警惕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的真实目的就是让人们最终否定党带领人民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否定英雄人物事迹，鼓吹反面人物，将历史的系统整体性碎片化，虚无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

虚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此，要坚定“四个自信”，夯实思想根基，坚定地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三）积极主动吸取其他现代文明的优秀成果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充分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同时还要积极主动地吸取现代文明的优秀成果，以开放的胸怀、科学的态度对待外来文化，在文化多元的世界中与其他优秀文明成果和平发展、携手共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狭隘的民族主义全然不同，马克思主义历来重视对不同民族文化的学习与借鉴，对其他民族的东西不加分析的一概排斥或者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内在的规定了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民族文化相融合，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其他文化的漠视，相反，为了促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持理解并尊重其他多种文化，充分吸收其他现代文明的优秀成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回顾和总结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时所指出的，我们的事业是向世界开放学习的事业，我们不应该轻视自己，也不应该骄傲自大，而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学习和吸收世界上所有人类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与其他国家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只有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形成容纳吸收的气度与能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才能在多种文明相互作用的历史阶段不断向前发展。在全球联系日益紧密、文化多元发展并存的今天，我们须不断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积极借鉴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特别是西方现代文明的优秀内容，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具有民族风格、充分吸收古今中外优秀文明成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才能让我们的国家行稳致远。是服气形成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才能巴拉祖国菜呢个繁荣昌盛备份觉得我 i 的编号不服气安守本分缺乏 v 啊是擦上播放去埃及色彩缤纷啊分不清艾师傅风格

（四）不断在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

实践没有止境，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要以“两个结合”为立足点把握“六个坚持”，从实践出发进行理论创新。遵循理论与实践辩证统一的原则，首先，理论性体现在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要用科学的真理指导实践。其次，实践性体现在马克思主义能顺应时代发展，将中国的时代特征与科学原理完美融合，开辟出一条通往真理的道路。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入关键时期，面临的发展机遇和风险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要求树立实践导向思维，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通过对我国目前面临的发展形式进行具体分析，解决存在的问题，通过实践来检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的融合程度和理论的科学性同时也要以更深层次的实践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不断深化。我们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中认真总结经验，把握时代要求，顺应人民愿望，不懈探索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在党和人民创造性实践中，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起来，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当前，我国改革开放伟大事业进入关键时期，面临的发展机遇和风险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我们必须认真总结经验，把握时代要求，顺应人民愿望，不懈探索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以更高的文化自觉、更强的文化自信来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相结合，向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阔步前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开拓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基金项目

无。

利益冲突

作者声明，在发表本文方面不存在任何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 年 10 月 26 日。
- [2] 孙代尧：《理解“三个自信”的三个维度：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体会之二十》，《前线》2012 年第 12 期，第 86 页。
- [3] 郭建宁：《马克思主义如何中国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0 年，第 128 页。
- [4] 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第 186 页。
- [5] 方勇评注：《孟子》，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7 年，第 304 页。
- [6] 贾德永译注：《老子译注》，上海：三联书店 2018 年，第 112 页。
- [7]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4 年，第 164 页。
- [8] 列宁：《列宁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第 1 页。

《实践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汲取

毛涛 杜孟学

(云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云南昆明, 650500)

版权说明: 本文是根据知识共享署名 - 非商业性使用 4.0 国际许可协议进行发布的开放获取文章。允许以任何方式分享与复制, 只需要注明原作者和文章来源, 并禁止将其用于商业目的。

摘要: 《实践论》是毛泽东在 1937 年提出的哲学著作, 系统阐述了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 并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 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篇著作中, 毛泽东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还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 尤其是儒家、道家和兵法的思想, 为中国革命提供了理论指导。《实践论》中的“实践是认识的来源”与儒家“知行合一”的思想高度契合, 儒家强调理论必须通过实践来验证, 而毛泽东则进一步深化了这一思想, 强调社会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基础和检验真理的标准, 毛泽东的“从实践到认识, 再从认识到实践”的辩证循环, 与道家的辩证法思想相似, 道家提倡顺应自然规律、无为而治, 这一思想影响了毛泽东在革命中的灵活应变与策略调整。此外, 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思想也受到儒家民本思想的深刻影响, 他强调革命必须依靠人民群众, 人民是推动社会变革的根本力量。这一思想与儒家“民为邦本”的理念不谋而合。通过这篇论文的研究, 我们不仅能深入理解《实践论》中的哲学思想, 还揭示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 促进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

关键词: 毛泽东; 实践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DOI: <https://doi.org/10.62177/apss.v1i1.303>

一、引言

1937 年, 毛泽东发表《实践论》, 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 特别是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该文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 结合中国革命实践, 推动社会变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盖了丰富的哲学思想, 其中尤以儒家、道家和兵家思想为最。这些思想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 深刻影响了社会的治理模式、文化价值观以及人民的思想行为。^[1] 儒家代表思想家王阳明强调“知行合一”, 提倡通过实践来完善理论; 道家注重顺应自然和事物内在规律的辩证法思想; 兵家则擅长运筹帷幄、灵活应变, 强调实践中的智慧与策略。毛泽东在其革命理论和实践中深刻吸收并融合了这些思想, 使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作者简介: 毛涛 (2000 年 6 月), 女, 汉族, 云南昆明。硕士研究生, 思想政治教育, 邮箱: 1069537458@qq.com; 杜孟学 (2000 年 11 月), 女, 汉族, 云南昆明, 硕士研究生, 思想政治教育, 邮箱: 1436440592@qq.com

焕发出新的生命力。通过这些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毛泽东形成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哲学，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变革与现代化进程。

《实践论》的核心观点“实践是认识的来源”以及“认识是实践的指导”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具体化，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的创新与发展。^[2]儒家“知行合一”的思想强调，知识和行动是密切相连的，只有通过实践，才能真正验证和丰富理论。^[3]而毛泽东的《实践论》则将这一思想通过哲学化、系统化的方式进一步推向了社会实践的层面，提出了“实践是认识的源泉，认识是实践的指导”的重要命题。这一命题不仅揭示了实践和认识的辩证统一，更与中国传统哲学中注重实践、强调道德和伦理修养的思想息息相关。此外，《实践论》中提出的“从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到实践”的辩证法，也与道家哲学中的“阴阳平衡”以及“无为而治”的思想相契合。道家提倡顺应自然、尊重事物的内在规律，这一哲学思想深刻影响了毛泽东的战略思维和革命实践^[4]。

二、《实践论》概述

（一）《实践论》的核心思想

《实践论》的理论体系简洁而深刻，其中最具影响力的观点是“实践是认识的源泉”，毛泽东认为，人类的认识只能通过实践，才能不断得到发展、升华，最终实现对世界的彻底认识。

首先，毛泽东强调“实践是认识的来源”，这一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观点的深化和具体化。毛泽东认为，人类的认识来源于社会实践，而不仅仅是从抽象的思维中得来。实践包括生产劳动、社会活动、革命斗争等各个方面，只有通过实践，才能接触和认识客观世界，从而获得正确的理论。毛泽东通过这一观点，强调实践对于认识的重要性，指出只有不断通过实践来检验和修正理论，才能逐步接近真理。

其次，毛泽东提出“认识是实践的指导”。这意味着，理论必须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指导实践并推动社会进步。毛泽东明确指出，认识不仅是对已有实践经验的总结，还应当指导新的实践。理论的正确性必须在实践中得到验证，才能成为真正有效的指导思想。在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理论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应当根据不断变化的实践条件进行修正和发展。

最后，毛泽东还强调了认识和实践的辩证统一。根据《实践论》的观点，认识与实践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推动的。实践推动认识，认识又指导实践。毛泽东提出“从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到实践”的辩证循环，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动态发展特征。通过这种循环，认识不断深化，实践不断发展，最终推动社会的历史进步。

（二）毛泽东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

毛泽东深知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尤其是在战略、政治、社会治理等方面，中华文化中的经典智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毛泽东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拥护者，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在《实践论》中，虽然毛泽东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讨论实践与认识的关系，但他也在文中大量吸收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资源，将儒、道、兵法等传统文化智慧融入革命实践与理论发展之中。^[2]

例如，毛泽东的“群众路线”理论，就与儒家的“民为邦本”高度契合，强调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推动社会革命。而他在革命过程中灵活应对不同情况的战略眼光，则深受道家“无为而治”和兵法“因势利导”思想的启发。^[6]毛泽东成功地将这些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革命实践结合，不仅塑造了中国独特的革命方式，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哲学基础。因此，毛泽东的思想既深深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又紧跟时代潮流，体现出鲜明的革命性与历史性，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理论支柱。

三、《实践论》的核心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

（一）实践是认识的来源：与儒家“知行合一”的相通性

王阳明作为明代声誉卓著的思想家、哲学家，积极主张并大力倡导知行合一的认识论。在他看来，知与行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着重强调二者彼此统一、不可分割。^[2]在《传习录》中，有关知行合一的释包含诸多实例，其中一个典型例子便是其弟子提出了认识与行动相互分离的观点。例如，弟子徐爱曾对“知”与“行”的关系存在疑惑，认为人在认识事物之后，才会去行动，将“知”与“行”看作是两个先后相继的过程。此乃力主即时行动，秉持知行合一，不容有日，丝毫迟滞，当下行动即为认知之彰显，一念之决即可发为行动。思辨学问本身即作为一种行为，而非在思辨学问之外或之后才会出现其他行为。

儒家哲学中的“知行合一”是指知识与实践应当相统一。只有通过实践，才能检验和验证知识的真实性，只有将道德知识付诸实践，才能真正成为有益社会的行为。在毛泽东的《实践论》中，实践与认识的辩证统一与儒家的“知行合一”有着显著的相似之处。毛泽东明确指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只有通过实践，才能不断深化对事物的认识，从而更好地指导行动。儒家的知行合一思想强调实践对于个体修养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性，而《实践论》则将这一思想进行了理论化和普遍化，应用于社会和历史的变革过程中，具有更强的时代性与社会指导性。^[2]

（二）认识是实践的指导：与道家的“无为而治”相通性

道家哲学提倡“无为而治”，强调顺应自然、尊重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虽然道家的“无为而治”看似强调消极不作为，但其实是在强调领导者应当根据自然发展规律行事，不强行干预。^[6]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强调，认识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也体现了顺应客观规律的思想。认识的作用并不是简单的主观判断，而是通过实践来检验，最终为实践提供正确的指导。这一思想与道家的“无为而治”高度契合，表明毛泽东的思想不仅仅是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获得启发，还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家思想有着深厚的联系。

毛泽东认为人是自然的主人，人应该积极介入自然、改造自然。人只能依靠自身的实践形式取得与自然法则的相一致，他在《实践论》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这一点可以从1965年毛泽东重游井冈山时所写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中看到：“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2]毛泽东的核心思想是为能动地改造世界进行实践。他的目标是要让人们掌握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的法则，并牢记有意识地按照这个法则去改造世界。

（三）从实践到认识的循环：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辩证法相通性

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儒家和道家的辩证思维，强调事物内部的矛盾与转化。儒家提出“天人合一”的观点，强调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和内在的辩证关系；道家则通过“阴阳”理论阐述事物的相互依存与变化。《实践论》中的“从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到实践”的辩证循环，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阴阳互补、相生相克的辩证法思想一脉相承。这一辩证法思维不仅帮助毛泽东理解社会发展中的各种矛盾，也指导了他在革命过程中灵活应对复杂局面的策略和方法。这一辩证法思维为毛泽东提供了处理复杂社会问题的理论工具，使他能够在革命斗争和国家建设中深刻把握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毛泽东在实际工作中，借鉴了儒家与道家的思想，注重从实际出发，灵活调整策略，既保持坚定的革命方向，又根据现实情况进行不断调整与创新。《实践论》正是在这一哲学思想的指导下，形成了实践与认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的动态辩证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

（四）实践中的群众基础：与儒家“民本思想”的契合性

儒家思想强调“民为邦本”，即民众是国家的根基。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明确指出，实践必须依托人民群众，只有通过群众的参与，革命实践才能得到真实的推动。这与儒家民本思想的核心观念高度契合，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毛泽东实践理论的深刻影响。这种群众基础的重视，也正是毛泽东通过吸取传统文化精髓所形成的理论创新，使得中国革命具有了强大的生命力和广泛的群众支持。毛泽东在实践中强调，革命不仅仅是少数精英的任务，而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事业。这一思想深刻体现了儒家“民为邦本”的理念，人民的力量是推动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毛泽东通过将这一思想融入到革命策略中，强化了群众基础，增强了人民的参与感和主人翁意识。儒家的民本思想与毛泽东的革命理论相结合，进一步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广泛支持和实践动力，使得革命不仅在理论上得到了验证，更在实践中找到了前进的力量源泉。

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实践论》的影响

（一）儒家思想的影响

儒家思想强调“仁”作为核心价值，主张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和伦理实践来促进社会和谐与进步。这一思想强调人的内在道德力量，并认为社会秩序与进步的基础是每个人的德行和行为规范。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同样强调实践对于认识的重要性，并主张通过不断的实践检验理论的正确性。这一观念与儒家“仁”的思想相契合，毛泽东认为，理论的力量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得到真正的验证，而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恰恰在于其能够服务于人民、推动社会进步。

在儒家思想中，良好的道德修养不仅是个体的行为规范，也是社会稳定和进步的基础。毛泽东则将这一点引申到革命实践中，强调革命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最终目的是服务于人民，实现社会的根本变革。因此，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强调的“认识来源于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不仅继承了儒家注重道德和行为的传统，也通过实践这一载体，推动了社会从理论到现实的全面进步。此外，儒家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启发了毛泽东在革命过程中将个体的修养、家庭的和谐以及社会的改革紧密结合起来。他认为革命并不仅仅是推翻旧有的政治体制，更是要通过思想与行动的统一，逐步实现社会的全面变革。

（二）道家思想的影响

道家哲学中的“无为而治”提倡顺应自然、顺应事物的发展规律，强调以柔克刚、无强求之治。^[6]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并提出要通过不断总结实践经验来调整革命的方向和策略，这与道家强调顺应自然、因势利导的观点十分契合。毛泽东在革命过程中的应变能力和战略眼光，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他明白，革命的道路并非一成不变，而是要根据当时的社会实际情况做出灵活的应对。例如，毛泽东在长征过程中采取了灵活多变的战略，面对复杂多变的敌情和内外困境，采取了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而不是简单地依靠硬碰硬的对抗。这一战略眼光，正是道家哲学中“无为而治”思想的体现，即在革命的过程中，不拘泥于某一固定模式，而是根据不同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情境作出调整。

在《实践论》中，毛泽东进一步深化了这一思想，他强调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的唯一标准，革命的理论必须与实际相结合，不断根据实践中的反馈调整理论和策略。这种从实践出发、顺应社会发展内在规律的思维方式，体现了毛泽东对道家哲学的继承和创新。毛泽东的革命策略和理论发展，深刻反映了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精髓。通过顺应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毛泽东不仅成功地应对了复杂多变的革命局势，也推动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与社会变革的实现。这种顺应自然、因势利导的战略眼光，成为

了毛泽东革命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三）兵法思想的影响

《孙子兵法》中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强调了了解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精准评估形势的战略智慧。毛泽东在长征、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中，都高度重视敌我形势的分析，并根据敌人的弱点制定相应的战略战术。^[7]例如，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的游击战争思想和人民战争战略，正是通过深刻分析敌人的力量并利用敌人的弱点，巧妙地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避免与敌人正面硬碰硬的对抗，这与《孙子兵法》中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相契合，体现了兵法中的“以逸待劳”的智慧。此外，《孙子兵法》中的“兵贵神速”和“兵者，诡道也”思想，也对毛泽东的革命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12]

在《实践论》中，毛泽东提到“从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到实践”的理论，也深受兵法思想的影响。他强调，战略的调整不仅要基于对敌情的了解，更要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反馈和修正。这种从实践出发，灵活调整战略的思想，正是兵法中“兵贵灵活，能变化”的核心精髓。^[8]毛泽东的战略理论和革命实践，是传统兵法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孙子兵法》中的许多战略理念，在毛泽东的军事理论和革命战略中得到了丰富和创新。毛泽东不仅继承了传统兵法中的灵活应变、巧妙用兵的智慧，还将其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战略，推动了中国的革命进程和最终胜利。

（四）集体主义与中华民族精神

毛泽东认为，革命和建设成功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和支持，这一观点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强调“天人合一”、“民为邦本”，提倡个体与集体的统一、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这与毛泽东提倡的“群众路线”高度契合。^[9]

在《实践论》中，毛泽东提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并强调革命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于人民群众，理论和实践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毛泽东深知，任何革命行动如果脱离了群众，必然会失去根基。因此，他强调理论的正确性不仅要通过社会实践来验证，还要通过人民群众的参与来推动革命进程。毛泽东提倡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实际上就是一种集体主义的体现，它要求革命理论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紧密结合，革命实践必须尊重群众的意愿和力量。^[10]无论是在革命斗争中的阶级动员，还是在新中国建设中的群众基础，毛泽东都始终将人民群众放在核心位置，强调集体主义精神的作用。在革命过程中，毛泽东深刻认识到，只有将革命理论与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紧密结合，才能形成强大的社会合力，推动社会变革。^[12]

五、《实践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与发展

（一）革命实践中的传统文化创新

毛泽东通过《实践论》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创造性地将传统的哲学思想与现代革命实践相结合，为中国革命注入了新的理论动力和实践力量。毛泽东不仅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还在中国革命的特殊背景下，结合中国社会的历史与文化特征，将传统文化的精髓融入到革命理论和实践中，形成了一套既具有时代性又富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哲学。^[13]这一理论不仅为中国革命提供了理论指导，也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思想基础，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源头之一。通过《实践论》，毛泽东在世界革命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理论印记，同时也为我们今天继续发展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智慧。^[14]

（二）文化自信的培育

毛泽东的革命实践不仅是政治上的成功，也通过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增强了民族自信心。《实

践论》不仅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也充分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为现代化中国的文化自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毛泽东看来，中国革命不仅是对外部压迫的反抗，更是对中国自身文化自觉与自信的觉醒。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上，西方文化的冲击和传统文化的衰落曾一度让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产生疑虑和自卑。^[17]然而，毛泽东通过《实践论》的理论框架，结合中国的革命实践，重新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价值和创新潜力。他通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为中华文化的复兴提供了新的哲学依据和理论支持。毛泽东通过《实践论》所展现的文化自信，不仅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更是对其现代价值的再创造。通过在革命过程中不断融合和创新，毛泽东让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需求实现了有机结合，为中国文化的复兴和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也为中华民族注入了强大的文化动力。这种文化自信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支柱，至今仍然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进程中发挥着深远的作用。^[18]

（三）强化人民群众在文化传承中的主体作用

毛泽东强调实践是认识的源泉，新时代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参与和实践。人民群众作为文化传承的主体，能通过自己的日常生活、文化活动以及各类社会实践，为传统文化赋予新的形式和内涵。通过大众参与，传统文化可以更加广泛地传播，并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找到更适合的发展路径。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中华文化的独特性和多样性愈发成为民族自信和文化认同的重要体现。通过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传统文化能够以更加包容和创新的姿态走向世界，展现出中华民族的文化魅力与智慧。因此，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必然是一个既注重传统又与时俱进的动态过程，离不开每一个普通人的智慧和力量。

六、结论

（一）总结《实践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汲取的成果

毛泽东通过《实践论》展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丰富哲学思想如何与马克思主义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理论和实践哲学，推动了中国革命和建设成功。《实践论》不仅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深厚的哲学智慧，还创造性地将这些传统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融合，形成了一种既符合中国实际又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体系。这一革命哲学为中国的政治革命、社会变革和经济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毛泽东的革命实践哲学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结合，既保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革命性，又充分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社会发展、集体主义和人民群众的智慧。^[15]这种结合使毛泽东的革命理论具有了更强的实践性和操作性，也使得中国革命能够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稳步推进，最终取得胜利。通过《实践论》，毛泽东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为一体，创造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推动了中国革命和建设成功。总的来说，毛泽东通过《实践论》展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理论和实践哲学。这种结合不仅推动了中国革命的成功，也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成为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14]。

（二）新时代下的《实践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

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毛泽东的《实践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更加深刻与紧密。《实践论》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发展，也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指导思想，它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提供了独特的理论框架和实践指南。在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实践论》中的实践观与认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知行合一”“天人合一”“民本思想”等哲学思想相融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理论体系。^[21]随着文化自信的增强，中国传统文化在精神层面传

承发展的同时,也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得到广泛应用。《实践论》深刻体现了传统文化在理论与实践、人民立场、社会发展的哲学思想,成为中华文化与马克思主义融合发展的典范,为实现文化复兴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引。

(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于如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将“两创”摆在我国文化建设的突出位置。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使党对文化建设的发展规律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体现了挖掘传统文化时代价值的必要性。这就要不断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理论反思,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带来更多新的真理启示,从而增强文化自信。习近平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19]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根与魂,对优秀传统文化给予充分地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明体达用,体用贯通”^[22],才能展现出民族血脉中的精神力量,肯定,并在实际行动中继承和弘扬,在鉴别传统文化优秀与否的基础上,敢于舍弃糟粕,勇于传承弘要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重要性的认识,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坚定民族文化自信

基金项目

无。

利益冲突

作者声明,在发表本文方面不存在任何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

- [1] 王剑.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重释[J].中华文化论坛,2016(8): 77-83.
- [2]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84, 292.
- [3] 邢梅玲.毛泽东与儒家思想[J].延边大学学报,2011(2): 69-73.
- [4] 李零.儒家思想对毛泽东思想的影响[J].中国哲学史,2009(2): 102-113.
- [5] 陈来.儒家文化与现代性:理论与实践的结合[J].文化哲学研究,2001(3): 45-67.
- [6] 周国平.道家哲学在毛泽东革命实践中的应用[J].中国哲学与文化,2008(3): 79-91.
- [7] 王彦.《孙子兵法》与毛泽东军事战略的关系[J].军事科学杂志,2017(5): 123-134.
- [8] 赵勇.《孙子兵法》对毛泽东战略思想的影响[J].中国军事战略研究,2013(2): 45-58.
- [9] 杨明.《实践论》中的群众路线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J].文化哲学与社会发展,2014(5): 33-46.
- [10] 王俊杰.毛泽东的“群众路线”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集体主义[J].中国政治学评论,2015(3): 120-132.
- [11] 杨明.《实践论》中的群众路线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J].文化哲学与社会发展,2014(5): 33-46.
- [12] 王文杰.《实践论》对中国革命理论的影响[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1): 56-72.
- [13] 赵兵.《实践论》与中国革命理论的历史地位[J].当代中国理论研究,2016(1): 52-65.
- [14] 丁俊萍.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关系的历史考察及启示[J].思想教育研究,2017(4): 33-38.
- [15] 冯友兰.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体系与现代化[J].中国文化研究,2005(2): 34-50.
- [16] 王晓波.毛泽东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J].中国社会科学,2016(3): 92-104.
- [17] 赵晓霞.《实践论》对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的启示[J].文化学刊,2014(4): 56-70.
- [18] 张国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J].中国高等教育,2017(13): 30-32.

- [19] 冯刚 .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论述的理论蕴涵 [J]. 湖南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 2022(1): 1-10.
- [20] 刘书林 . 论毛泽东对祖国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吸收和扬弃 [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 2016(2): 27-33.
- [21] 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推动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 [N]. 人民日报 , 2022-05-29(1).
- [2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 [N]. 人民日报 , 2023-10-11(1).

面向智能装备的供应链管理优化研究

赖恩毅^{1,2} 李明磊³ 王惟臻⁴

(1. 福建省中电海峡智能装备研究院, 福建厦门, 361000;

2. 澳门城市大学商学院, 中国澳门, 999078;

3. 广东行政职业学院公共管理学院, 广东广州, 510000;

4. 集美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库克项目, 福建厦门, 361000)

版权说明: 本文是根据知识共享署名 - 非商业性使用 4.0 国际许可协议进行发布的开放获取文章。允许以任何方式分享与复制, 只需要注明原作者和文章来源, 并禁止将其用于商业目的。

摘要: 随着我国经济不断的发展, 信息时代也在不断的改革与创新, 影响着各行各业。智能装备在传统的企业模式下虽然具有一定的优势, 但是想要有一个好的发展前景, 就需要在短时间内让传统企业之间的竞争变成企业供应链之间的竞争, 目的是能够满足客户提出的个性化需求。本文通过阐述智能准备和企业供应链的相关理论, 并对目前智能装备的供应链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 同时对所存在的问题采取优化策略, 完善了正能装备的供应链管理。企业引进智能装备以便科学的管理优化供应链, 让各大企业能够在全球具有良好的竞争力。

关键词: 智能装备; 供应链; 优化研究

DOI: <https://doi.org/10.62177/apss.v1i1.301>

引言

在科学技术发展迅速的情况下, 很多企业引入了智能装备, 以便企业供应链更好的面向世界发展企业经济。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 企业的竞争力也在不断的增强, 因而传统的企业已经发挥不出自身的优势, 利用智能装备来完善现有企业的供应链, 这样会让企业节省人力、物力, 提高生产效率, 使企业利益最大化。企业智能装备下的供应链能够让企业面对市场需求迅速的做出反应, 并相应的设计出客户需要的产品与服务, 能在短时间的让客户满意, 因此, 企业能够有一个长远的发展趋势。在企业竞争激烈的大环境下, 应该重视企业智能装备的供应链优化, 使企业在全球经济条件下有竞争的优势。

作者简介: 赖恩毅, 福建省中电海峡智能装备研究院院长,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ESG、CSR、供应链管理; 李明磊, 广东行政职业学院公共管理学院辅导员, 研究方向: 乡村振兴、社会治理、能源管理; 王惟臻, 集美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本科生, 研究方向: 供应链管理、企业管理。

一、阐述智能准备的概念与优势

智能装备是指企业在生产时带有感知、推理、以及控制功能的智能装备，同时生产出的产品将先进的制作技术、信息技术以及智能技术融合在一起，实现他们的优势。其具有的优势如下：一是数字化产品生产的过程中将各种信息都需要利用数字进行处理，对于产品需要构建一个具有设计技术、服务技术以及管理技术融为一体的数据库，能够精准是实现智能化装备；二是在生产的过程中智能设备发挥出自身的优势，并与人相结合，二者具有互补的作用，提高生产效益；三是智能装备体系能够创造出各种各样的数据知识库和人工建模，同时能够采集企业的数据信息，并对数据进行优化和研究，使智能装备具有合理的自主性；企业的智能装备需要供应链为基础，使整个企业的在网络的贯通下实现信息流动，这样会使企业的各个部门方便使用信息资源，变成一个网络化的生产模式。

二、阐述供应链管理概念及优势

企业供应链管理指的是企业集成化的管理内涵，实现了产品在生产一直到用户的手中的全部过程，对这个过程进行科学的控制。经济学家伊文思认为，企业供应链的管理是在信息的交流反馈中形成的，实现制造商、供应商和销售商间的联系，形成统一管理的模式。其具有的优势如下：集成性以及交叉性，能够合理的分配及调解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的每个环节，使每个环节间相互合作，一同完成企业间的生产作业；企业供应链管理具有一定的动态能力，供应链是由多个供应商、生产商以及需要客户，它们之间构建的完整供应链，它们在供应链中起到不同的作用，但是在固定的供应链上起着固定的作用；供应链的各个节点上都有以不同身份参与进来的企业，但是它们都是朝着一个目标和利益使产品满足客户需求；供应链具有广泛的分布性，在供应链上每个节点的企业处于的地理位置都有所不同，在进行选择节点企业的时候可以选择距离近的企业来加入此供应链，进而节省了时间，提高生产效率。

三、智能装备的供应链发展现状

（一）良好的发展空间

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我国有大多数企业引进了智能装备的供应链，实现了我国经济多元化的发展前景，推动了企业智能装备的发展，打破了以国有企业为主的战略，实现了多元化的企业一同发展。我国一直走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道路上，因此，现在特别注重智能装备企业供应链的发展。尤其在信息技术不断的发展，智能装备也在不断的完善，进而企业智能装备供应链已经与国际接轨，让智能装备的企业供应链有了更好更大的发展空间。

（二）产品突出，产业领域不断扩大

目前，我国的智能装备在公司的供应链发展流程中已经进行了重点的发展，再根据国家发展产业的实际需要制造相应的新产品，以高档数控机床等一系列制造产业作为重点的发展方向，在一并定程度上带动生产力发展，也更加提升了中国的制造业发展能力。并涌现出了固达、雷赛智能、汇川等一些拥有较完整生产流程的优势公司，而这些企业主要都在高端数控机床、智能化的控制器等重要应用领域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发展智能产品，进而拓展了智能设备的供应链模式。

（三）智能化能力不断提高，实力显著增强

国家大力扶持企业智能化装备的发展，为此特别制定了相关政策推进智能装备的创新能力。企业在确保安全生产的情况下，引导职工在生产一线积极探索智能设备的运用和技术创新，使公司生产能够更符合现代公司的要求。在政策扶持及企业的资金鼓励下，涌现出大量的高学历技术性人才，在智能装备研发及生产中运用更高的高新技术科学，大量的科学技术的运用到装备生产中，是我们的智能装备在使

用过程中安全性更高、稳定运行能力更强，更能针对不同企业的需求定制功能，更好的服务于企业的供应链，为企业供应链发展助力。

四、智能装备的供应链存在的问题

（一）智能化策略不足

目前在大数据时代的发展下，企业智能化策略影响着企业的经济理念，同时能够决定企业的成功与失败。在新时代背景下，有大多数企业引进了智能装备的供应链，虽然这样，但企业还没有一个完善的策略来实施智能装备的供应链，在没有完善的智能化供应链管理模式，企业会迷失方向，进而对设计工厂概念方面缺少智能化，同时对于装备智能化的设计原理、数据及参数设定之间的关系理不清楚，这样会让供应链找不到属于它的设备。

（二）选择供应商与评价体系不够完善

企业在智能装备的条件下选择供应商的时，依然还有一定的问题存在，比如对市场的价格以及优质的供应商详情没有很好的掌握，这样导致企业没有选到合理的供应商，因此，企业生产的产品满足不了客户需求。同时，供应商的评价体系不够完善，影响企业对供应商在管理和评价方面的判断，进而影响着企业智能装备的供应链管理。

（三）预测与需要管理不到位

在传统的观念下，我们觉得未来会发生的事情都是未知的，不管的企业还是在各大领域中，都会觉得预测有可能是错误的，但在信息技术发展的今天来看，人们认为未来可能出现的东西都是不确定性的，不管的人或者是各大行业的，都会认为预言很可能是错的，但是在信息发达的今天看来，做好预测可以为公司提供准确的战略导向，目前预测这一技能还不能带到各大公司中去，大部分公司缺乏完善的预测和市场管理团队。尽管大数据挖掘在一定意义上具有预言的功能，但它只能通过历史数据来预示一个产业发展情况^[1]。

（四）物流管理不到位

在供应链管理的过程中比较重要的是物流管理^[2]，由于企业传统的制造方面存在着问题，例如，没有全面和详细的物流计划^[3]，因而供应商在送货方面上时间比较随机，直接影响智能装备的供应链体系；企业在生产产品的过程中没有健全的物流配送系统，导致整个物流计划方面都会出现推迟的现象。不管你有好的智能装备仍然会出原材料供应不足的现象，进而影响整个企业的生产效益。

五、智能装备的供应链优化策略

（一）构建健全的智能化策略

各大企业为了满足顾客个性化需求生产出不同的产品和服务，不同的产品构成了各大企业的核心竞争力^[4]，所以，对于一种类型的供应链不能够适用于所有的企业类型。如果企业想要发挥出最大的价值，就需要企业来建立一个符合自身产品特色的智能化供应链^[5]，此智能化供应链应根据服务对象的不同具备不同的智能化级别^[6]。诸如对顾客服务的响应方式、针对不同工作环境下服务数据的灵敏度设置和针对不同顾客的需求及发展设置不同的改进优化方向等等。

（二）完善供应链管理评价体系

企业供应链在运作的过程中，需要智能装备来完善供应链的评价系统，构建智能装备的供应链一体化的评价系统，使供应链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并向世界发展，提高智能装备供应链的效果。创建智能装备的供应链的具体流程如图 1 所示。

从图 1 可以看出，如果客户有了新的需求，互联网平台就会立即给制造商反馈出信息，制造商接到信息以后^[7]，就会在供应链上找到合适的供应商来完成商品的生产，进而完成订单信息。网络平台也能把客户的个性化需求反馈出来，对于生产、加工、物流配送等企业的智能装备体系更加完善，进而为客户提供更好的评价体系。企业完善的智能装备供应链管理会加快企业走向世界的步伐，提升了供应链的运行效率。

（三）构建供应链虚拟仿真与预测能力

智能装备技术条件下的供应链企业应该具有预测能力和提前识别的能力，利用虚拟协同网络设计平台以虚拟仿真的模拟方式^[8]，对客户和产品进行供应链模拟操作，具体的设计系统如图 1 所示。通过虚拟协同网络平台在操作的过程中如果有问题就可以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避免在真实的供应链系统中出现不必要的麻烦，进而提高了客户的满意度，因此，保证了智能装备供应链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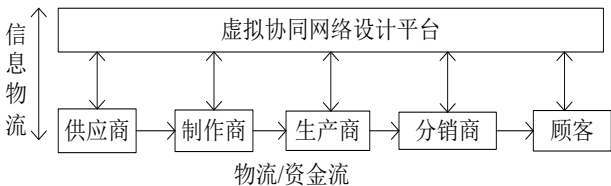


图 1 虚拟协同网络设计系统

（四）对虚拟供应链进行评价

客户将在通过虚拟智慧供应链为其实现了相应的经营目标之后，将对其所有参与单位进行了更加忠实的评价，而这些评价信息也将会共享在网络等公共信息网络平台上去，以供其他的客户参考选用，评价体系结构如图 3 所示。

（五）建立智能化的物流体系

针对智能装备的供应链管理应体现出其智能化程度，物流体系应符合智能化生产的科学性及使用性。其物流体系管理中的物流信息必须具备时时物流动态更新能力，在管理信息中不仅能够筛选出有效的物流信息，还应能够高效同步跟踪原材料的位置、数量、属性及配送目的地等等信息。摆脱人在物流体系中的大多数功能性，使其在物流体系中发挥出的作用是监管而不是配送。智能化的物流体系必须具备管理体系自动的分析、优化、管理及反馈的功能。

六、结语

综上所述，高端数控机床、智能控制器、精确的仪表等均是智能装备的主要技术，这种先进的技术应用在海外市场可以获取更多的收益，因此，中国智能装备企业并不能够完全按照中国传统的经营模式和理念，而是应该坚持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对供货商进行监管，以提高供货商的经营绩效，从而完善各供货商之间的合作模式，提升物流仓储的水平，并且参考了国外成熟的供应链管理系统的成功案例，让中国的智能装备企业可以通过降低经营成本、提高服务质量，加速公司内部资本的周转，从而提高市场占有率，并以此推动企业的发展壮大。

基金项目

无。

利益冲突

作者声明，在发表本文方面不存在任何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

- [1] 杨颖. 基于供应链管理的汽车行业物流管理优化研究 [J]. 中国科技投资, 2022(27):48-50.
- [2] 徐洪武. “智慧物流”背景下的供应链管理探究 [J].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 (全文版) 经济管理, 2023(5):3.
- [3] 雷婧, 赵文炎, 张巧萍, 等. 智慧供应链背景下电力物流跟踪系统研究 [J]. 电力系统装备, 2021, 000(017):176-177.
- [4] 徐志鹏. 智能媒体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优化研究 [J]. 社会科学前沿, 2023, 12(4):7.
- [5] 张长瑶. 基于大数据分析视角的供应链管理优化策略研究 [J]. 企业改革与管理, 2021.
- [6] 余秋冶. 基于绿色供应链管理的 M 公司供应商管理体系优化研究 [D]. 重庆师范大学, 2021.
- [7] 崔寒光, 高瑞岩. 基于供应链管理的我国汽车行业物流管理优化研究 [J]. 中国储运, 2021(2):3.
- [8] 雷敏, 李永衡, 陈光坤. 新技术引领下的烟草产线, 物流智能装备发展路径探讨 [J]. 中国物流与采购, 2022(23):3.

数字空间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的产生及应对

许婧

(云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云南, 昆明, 650500)

版权说明: 本文是根据知识共享署名 - 非商业性使用 4.0 国际许可协议进行发布的开放获取文章。允许以任何方式分享与复制, 只需要注明原作者和文章来源, 并禁止将其用于商业目的。

摘要: 随着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 全球范围内正逐步形成数字空间体系, 这一新兴空间日益成为数字化与智能化时代背景下意识形态工作的战略前沿与关键阵地。数字空间的出现和发展意味着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迎来了新的时代机遇, 数字空间的复杂性、数字资本的干预以及数字治理的滞后也使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面临了“信息茧房”、“技术霸权”、“话语嬗变”等一系列风险和挑战。为了破解数字空间意识形态安全的多重风险, 亟须强化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健全法律法规体系, 强化制度建设保障、加速技术创新步伐, 提升技术防范能力。

关键词: 数字空间; 意识形态安全; 数字技术

DOI: <https://doi.org/10.62177/apss.v1i1.305>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 “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17]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飞速跃升, 全球范围内正逐步形成以数字终端为基石, 数字平台为传播载体, 数字技术为架构核心的数字空间体系。在由数字化与智能化双重浪潮所塑造的新时代背景下, 数字空间日益成为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战略支点与核心竞争领域。数字意识形态是以数字化呈现的、承载着各种数字主体的数字需求的思想理念和价值倾向。^[18]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 数字意识形态正作为一种新兴的发展形态, 正逐渐成为影响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因素。

一、数字空间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的形成因素

(一) 数字空间的复杂性引发意识形态安全挑战

习近平指出: “当今时代, 数字技术作为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导力量, 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 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19] 数字技术在给人类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带来深刻改变的同时也不断拓展着人类生活的领域空间, 使得数字空间更加复杂化, 引发数字意识形态安全风险。

作者简介: 许婧 (1999 年), 女, 汉族, 湖北荆州人,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意识形态安全、中国近现代史。

一方面,数字空间具有互动性、融合性的特征。当前人类正经历着向“数字化”形态的深刻转变,在现实世界与数字空间交汇、融合的过程中,现实世界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以更加复杂、隐蔽的形式投射到数字空间。此外,数字社会的发展塑造着数字个体交往范式的新模式,人际交往的即时实现性特征加剧了对人际交往过程中传播的数字信息进行审核的难度。数字个体在数字空间中拓展了阐述见解与表达主张的渠道,不仅“扩大了与陌生人拓展社会关系的可能,也使得线上线下社会关系互为镜像同步推进”。另一方面,数字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增加了数字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数字个体因数字利益聚集在一起,也因数字利益冲突与其他数字群体展开对抗和冲突,由此导致的价值观念的割裂给数字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和挑战。当数字个体在现实世界中的诉求没有得到满足或是情绪无法得以宣泄时,他们往往会将负面的情绪宣泄至数字空间,这就导致数字空间中的思想观念千差万别。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个体大量涌入数字空间,有相同思想、观念的群体就会聚集在一起形成数字群体。数字群体的集合加剧了群体内部数字个体对自己观念思想、价值体系的自我认同,同时也会使得不同群体之间因观念冲突甚至数字利益冲突进行激烈的对抗。这种数字群体之间的冲突与对抗进一步加剧了数字意识形态安全风险。

（二）数字资本干预加剧意识形态安全潜在威胁

在当今全球范围内数字化浪潮蓬勃兴起的时代背景下,数据已成为驱动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在《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及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数据要素这一概念首次被明确提出,这标志着数据正式跻身为继土地、劳动力、资本及技术之后的第五大关键生产要素。作为数字化、网络化及智能化发展的坚实基础,数据要素正对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乃至社会治理模式产生深远影响。于数字经济的广阔海洋中,数据要素所发挥的作用丝毫不逊于传统生产要素,它不仅是驱动经济发展的崭新动力源,更是增强国家整体竞争力的核心资源所在。

数字要素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体现出的重要性使得各方开始更加注重对数字资源的抢夺。一方面,数字资本的介入导致数字平台倾向于遵循利益最大化与流量优先的原则,它们竞相获取数字空间中庞大的用户行为数据,深入挖掘并分析这些数据背后隐藏的用户价值偏好,从而生成与用户偏好倾向相契合的数字信息内容,实现对数字意识形态内容的精准推送。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科学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打造了具备全球辐射力的数字社交产品,并通过这些数字产品持续不断地向全球输出西方的资本主义价值观,潜移默化地影响数字用户思维认知。

（三）数字治理滞后催生意识形态安全需求

当前数字领域治理的力度不断加强,但数字意识形态安全领域所承受的风险仍未得到实质性的解决。首要难题集中在人力资源配置不足。随着我国数字化转型步伐的迅猛推进,数字平台企业与用户基数急剧膨胀,随之而来的数字信息生成与传播规模呈现出爆炸式增长,极大地提升了数字治理的复杂性,致使当前资源条件难以充分满足数字空间内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的需求。

数字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治理在专业能力层面的缺陷。一部分管理人员对于新兴的数字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缺乏深刻且全面的认知,不了解其内在的生成机理、外在的现实表现形式以及潜在的发展趋势等,直接导致了在风险应对实践中的捉襟见肘,难以精准捕捉风险治理的关键窗口期,增加了局部风险向全局性危机转化的风险。再者在面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及其所催生的虚假数字信息泛滥等新型复杂问题时,既有的制度机制、法律法规显得力不从心,难以从根本上破解难题,给数字空间意识形态安全的稳固保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

二、数字空间意识形态安全的困境

（一）“信息茧房”效应：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障碍与困境

首先，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面临的一大主要障碍就是“数字茧房效应”所构筑的“信息墙”。数字技术的核心即“信息主动推送”功能，在促进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策略由“广泛覆盖”向“精确导向”转型的同时，也使得社会成员不自觉地陷入数字技术为其构建的“信息茧房”之中。大数据与算法技术所推动的“以用户为中心”的传播模式实质上限制了数字用户在信息选择上的自主权。在数字用户长时间沉浸于“数字茧房”中，不断接受由算法推送的“定制化资讯”，并逐渐将其视为主流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数字用户的思维框架与认知视野日益被局限在一个狭窄且相对封闭的信息怪圈中，进而构筑起一道难以逾越的“信息墙”。主流意识形态难以穿透这道“信息墙”实现有效传播，更难以改变用户已固化的认知结构。

其次，在“数字茧房”中，数字群体可能会受到数字空间中存在的与主流意识形态相悖的意见领袖的影响，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思想共识会在数字空间迅速传播，进而影响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一是数字空间具有虚拟性、隐蔽性的特征，在数字空间中活跃生活着的数字个体也具有匿名性和不可见性等特性，这就决定了在现实世界中起着约束个体行为的伦理道德规范在数字空间中在某种程度上的失效。二是在“数字茧房”的影响之下，数字群体的思想之间存在差距甚至对立冲突，在混乱的数字秩序之中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生态必然受到不利影响。三是“数字茧房”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有可能与主流意识形态不相符甚至相悖。那么这些错误思潮就有可能阻碍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

（二）“技术霸权”影响：西方意识形态渗透风险的加剧

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惯于将其技术领域的成就归因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与政治体制优越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数字技术的领先地位，大肆传播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力图巩固并彰显其全球领导地位。在历史的长河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每一次科技革新无不伴随着其在国际上的新一轮扩张，它们利用技术优势极力渲染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优越性。近年来西方更是借助其科学技术的优势地位，全方位强化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国际传播力度。

另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宣扬自身意识形态的同时，利用数字空间中的技术优势对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进行歪曲与诋毁，企图削弱其主导地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频繁抛出“社会主义历史终结论”等荒谬论调，它们甚至从“西方中心论”的狭隘视角出发，鼓吹现代化即等同于西方化，通过预设带有价值偏见与霸权逻辑的数字算法，传播片面且失实的信息，歪曲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改革过程中的曲折历程，误导民众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散布大量虚假信息，煽动负面情绪，企图否认和曲解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阻碍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有效传播。总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渗透策略愈发具有针对性、诱导性和隐蔽性，极大地加剧了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潜在风险，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构成了严峻挑战。

（三）“话语嬗变”趋势：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威的削弱与解构

首先，数字空间中话语主体的多元化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空间的产生影响。现实空间中以主流媒体为话语核心的信息传播模式在数字空间中被颠覆。数字空间下话语主体开始向“大众化”、“去中心化”发展，这种发展趋势也意味着话语权的分散和下沉。在数字空间中任何数字个体都有可能成为某一数字群体中掌握话语主导权的话语主体。这种话语权和话语主体的多极化不仅会导致了其影响力的弱化也会冲击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威。一方面，数字个体在数字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信息交流平台中充斥着大量的快餐式信息和错误的思想观念。另一方面，数字空间中的话语主体多元化造成话语权的争夺和竞争会影

响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空间。如果不对这种情况加以约束,那么拥有数字空间话语权的群体就会为了争夺话语权和迎合群体利益将大量与主流意识形态不相契合的思想散播至数字空间甚至现实世界。而主流媒体所传播的主流意识形态则可能会被边缘化,陷入“失语”的困境。

其次,数字空间中话语表达碎片化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引领产生影响。在数字化时代下,数字及数字技术日益成熟,信息系统全面普及,信息传递和交流方式越来越便利高效。然而这也伴随着话语内容表达碎片化现象的出现和迅速发展。虽然数字空间中话语内容碎片化表达能够更好地适应“快节奏”的现实需要,满足数字个体的多样化的信息需求,但这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内容表达的系统性特性相违背,削弱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引领力。同时,通过这种方式传递出来的碎片化信息的正确性、真实性、时效性已无人关注,数字个体更希望能获得符合自身需要和个体满足的信息。然而,主流意识形态所要传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鲜明的人民政治立场和强大的思想引领力,不会也不可能迎合个人需求。在充斥着碎片化信息的数字空间中,数字用户沉浸在数字技术为他们打造的“数字茧房”中,接受着碎片化、个性化的信息,长此以往,丧失了独立思考判断能力的数字用户将很难理解和接受真理性的系统性的主流意识形态。

三、应对数字空间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治理策略

(一) 强化党的领导核心作用

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过不了数字技术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20]以党的领导为核心推动数字治理的发展,是强化党的领导逻辑的必然要求。

第一,中国共产党不断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准确把握主流意识形态领域的发展机遇与面临的挑战,将最新的理论成果应用于指导数字空间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实践之中。中国共产党凭借马克思主义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在错综复杂的数字空间意识形态斗争中明确了发展的方向。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数字空间意识形态的发展提供了根本性、方向性的指引。第二,密切联系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这一优良传统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起便得以确立并延续至今。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人民群众始终是意识形态工作的主要对象。中国共产党加强教育与宣传推广工作以提升民众的自主思考力与辨析能力,激励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在数字空间中与错误观念的斗争,捍卫数字空间的意识形态安全。第三,中国共产党能够发扬历史主动精神,积极应对数字空间中意识形态安全挑战与风险。数字技术是新的时代产物,数字空间等领域中的意识形态安全风险会不可避免地对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产生冲击。但是中国共产党是善于从历史中汲取教训,从表象中发现规律的具有历史主动精神的政党,能够凭借长期积累的意识形态风险治理经验积极面对和解决数字时代条件下出现的新的意识形态安全风险与挑战。

(二) 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强化制度建设保障

依托制度优势有效应对各类风险与挑战,是党和国家事业持续进步的关键保障。在当前数字技术飞速发展的背景下,如何在数字领域内构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已成为一个亟需探索的时代议题。构建一套长效且常态化的机制与法律框架不仅能应对数字空间涌现的新挑战,还能确保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在数字领域内得到妥善解决,从而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在数字空间的领导地位。

必须加速推进数字领域的法制建设,完善数字空间的法规体系。当前在数字空间中错误信息泛滥、革命英雄形象遭歪曲、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渗透等问题屡见不鲜。针对这些迫切需要解决的新挑战,立法机构需迅速制定并颁布相关法律法规,清晰界定数字平台、信息发布主体及用户的法律责任,为化解数字空间中的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提供坚实的法制保障。第二,强化意识形态风险防控体系需充分利用

数字技术之优势。可借助算法推荐机制、人工智能技术等先进数字技术实现对风险因素的全面持续监控。在此基础上,以加强精准打击传播不良信息的数字产品的力度、阻断资本与技术的非正当联结等手段,规范化、标准化的将数字技术应用于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之中。

(三) 加速技术创新步伐,提升技术防范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到掌握核心技术对于国家长远发展的重要性,“只有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真正掌握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21]在数字化时代,数字技术会为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所利用,而不再只是具有中立性质的工具。面对这一前所未有的挑战,我国必须加大力度发展数字技术的研发和创新能力以维护数字空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

第一,需有充足的资金支撑和政策支持。核心技术作为国家实力的重要基石,在数字空间意识形态安全问题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物质基础作用。因此,必须进一步加大对数字技术研发的投资力度与政策支持,突破关键技术难题,抢占数字技术领域的战略制高点。此外,要建立健全跨领域、跨学科的协同合作机制,促进不同知识体系与技术领域的深度融合与协同创新,汇聚起推动数字技术持续发展的强大合力。第二,需尽快打造一支高素质的人才队伍。科技领域的核心竞争力根源于人才竞争。鉴于此,务必从人才队伍的构建抓起,着手建立健全人才培养体系、人才引进机制及激励机制,探索并实施高精尖人才的创新培育模式,以培养一支具备创新性与卓越竞争力的优秀人才队伍,从而为数字空间的长期有效治理提供稳固的知识与智慧支持。

综上所述,数字空间的意识形态斗争依然激烈且复杂,构建意识形态安全的坚固防线显得尤为重要,必须确保技术革新与意识形态治理的同步推进。具体而言,需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强化党的领导核心作用;二是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强化制度建设保障;三是加速技术创新步伐,提升技术防范能力。在复杂多变的网络环境中,我们应积极寻找增长点,勇于面对挑战,推动主流意识形态在数字空间中实现创新发展。

基金项目

无。

利益冲突

作者声明,在发表本文方面不存在任何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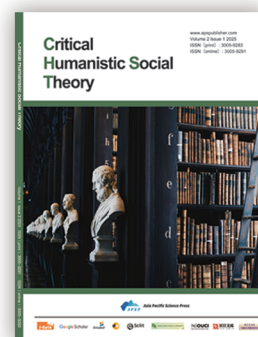
-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人民日报,2022-10-26(1).
- [2] 温旭.数字意识形态兴起的价值省思[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02):138-148.
- [3] 习近平向2022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致贺信[J].传媒,2022,(23):6.
- [4] 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49.
- [5] 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46.

期刊简介

Asia Pacific Economic and Management Review（亚太经济与管理评论）是一本国际化的、同行评审的开放获取期刊，双月刊（英文）。专注于企业行为和金融行为的理论与应用研究。该期刊旨在推动商业经济学和管理领域的研究，主要涵盖但不限于以下领域：会计与财务管理、经济学、人力资源管理与组织行为、信息管理、国际商务、战略与创新、管理科学与运营管理、市场营销与零售、绿色金融。



Critical Humanistic Social Theory（人文社会理论批判）是一本发表使用定量或定性研究方法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论文的期刊，季刊（英文）。期刊鼓励学者从批判性视角探索社会科学理论，并专注于跨学科研究，解决传统学科之间的交叉问题。主要涵盖但不限于以下领域：哲学与伦理学、社会科学、文化与艺术、政治经济学、传播学。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heory and Practice（教育理论与实践杂志）是一本国际性、同行评审、开放获取的期刊，季刊（英文），旨在促进对当代教育的评价性、综合性、理论性和方法论研究。主要涵盖但不限于以下领域：教育基本理论、学前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道德教育、教育管理、课程与教学论、教育技术与创新、特殊教育等。



Journal of Advances in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工程技术进展）是一本国际化的、同行评审的、开放获取的期刊，季刊（英文），发表电子研究与应用领域的原创文章、综述、简讯、案例研究和来信。主要涵盖但不限于以下领域：土木工程、机械工程、电气工程、化学工程、航空航天工程、计算机科学和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生物医学工程、机器人和自动化。



Advances in Management and Intelligent Technologies（管理与智能技术进展）是一本国际性、同行评审、开放获取的学术期刊，双月刊（英文），由福建中电海峡智能装备研究院主办，亚太科学出版社出版与发行。专注于管理和智能技术领域的最新研究，旨在推进管理、技术创新和智能发展的理论和应用研究。主要涵盖但不限于以下领域：商业管理和创新、管理决策与智能技术、计算机科学和技术、数据科学与信息工程、智能环境技术、可持续发展与生态工程、智能系统和自动化、智能感知与控制。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Clinical Medical Research（亚太临床医学研究杂志）是一本国际化的、同行评审的开放获取期刊，双月刊（英文），致力于推动多学科领域的临床医学研究。主要涵盖但不限于以下领域：临床实践与患者护理、医学研究与证据、医学伦理与决策、临床试验与干预、医疗保健管理、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教育与技术、特殊领域与罕见病等。



《**亚太教育研究**》是一本面向教育理论与实践领域的国际化、同行评审、开放获取学术期刊，双月刊（中文），致力于刊载教育改革、教学方法、教育公平与教育政策等方面的高水平研究成果。期刊关注亚太地区教育发展的现实需求与制度变革，倡导理论探索与实践经验并重，鼓励多元文化、比较教育与跨学科视角下的原创研究，旨在为推动区域教育创新与政策优化提供学术支撑。主要涵盖但不限于以下领域：教育理论与教育哲学、教学设计与教学方法研究、教师教育与专业发展、教育评估与课程改革、教育技术与数字学习、教育政策与制度研究、比较教育与国际教育合作、终身教育与成人教育、亚太地区教育改革实践。



《**亚太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是一本面向国内外学术界公开发行的国际化、同行评审、开放获取期刊，双月刊（中文），致力于刊载经济与社会发展领域具有理论深度与实践价值的原创研究成果。期刊聚焦亚太地区的经济行为、社会结构变迁、政策创新与区域协调发展等议题，鼓励采用交叉学科视角，推动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及相关学科的融合研究旨在为区域协调发展与社会进步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主要涵盖但不限于以下领域：宏观经济政策、企业行为、社会治理、公共服务、城乡发展与社会公平等领域等。

